

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 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

陳時龍*

明代科舉雖然號稱五經取士，然士人只要嫻熟一經即可以博取功名，故業科舉者皆有其本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的士子多以《春秋》為本經，在鄉、會試中成績突出。窮其源，則宋元以來安福的《春秋》學傳統、明初鮑琮的《春秋》經學教育，是安福《春秋》興起的基礎；溯其流，鮑琮門人劉球、吳節等人的科舉成功及其在翰林院、國子監授徒講學，初步確立了安福《春秋》的全國性影響，而此後彭時、彭華、鄒守益、鄒德溥等一代代安福士子在科舉上的成功，形成了安福《春秋》學的一波波高潮。在此背景下，安福縣形成了不少以《春秋》為家學的家族，如荷溪伍氏、葛溪劉氏、松田彭氏與智溪彭氏、澱源鄒氏，構成安福《春秋》世代不衰的社會基礎。這些家族因師承、婚姻而結成密切的交流圈，但又不對外封閉。安福學者的《春秋》經說亦常因為移民、士子教塾以及經義文字的出版等原因向外傳播。安福《春秋》在十五、十六世紀維持了約二百年的繁榮，大約從明嘉靖年間起開始遇到傳統對手麻城縣以及新興的晉江等縣的挑戰。進入十七世紀，安福《春秋》經的科舉優勢進一步削弱。但是，作為安福縣傳統的經學資源，從清初到十八世紀末，《春秋》依舊是不少安福士子用來考取低級功名的工具。隨著清朝乾隆年間科舉政策的調整，經義移置次場，且五經各出一題一概作答，經義在科舉考試中降到次要位置，且士子也不復有選擇本經之必要，以安福《春秋》為代表的科舉體制下地域專經的歷史遂告徹底終結。

關鍵詞：本經 安福 春秋 科舉 地域專經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明代科舉體制下的經學與地域研究」（項目編號13CZS017）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萬曆三十三年 (1605)，劉元卿 (1544-1609) 在為劉孔當 (1557-1605)¹ 所撰〈行狀〉中記載：「萬曆壬申 (1572)，……君年十六，家徒四壁，母又新寡，幾廢學。久之，從今郡司馬在吾伍君學《春秋》。在吾，君妻兄也。伍姓諸少年各珍其先輩《春秋》，秘之。君憤曰：『夫其先輩獨非人乎？吾特不銳意學，學何必弗如之？奈何俯首拾人餘唾為？』……乙酉舉於鄉，……上春官，中式第三人。」² 故事的主人公劉孔當，字任之，號喜聞，萬曆十三年 (1585) 以《春秋》經中江西鄉試第二十八名，萬曆二十年會試第三，殿試授二甲第二名。³ 在萬曆二十年會試中，《春秋》經只有一房，而房考是翰林院編修鄒德溥 (1583 年進士) 和工部主事詹在泮 (1583 年進士)。鄒德溥 (1549-?)，字汝光，號四山、泗山、覺海居士，同為安福縣人，且是劉孔當之經師。劉元卿〈行狀〉稱：「四山故取主，又經師也。」鄒德溥在〈翰林院編修喜聞劉公墓誌銘〉中亦自述其與劉孔當的淵源：「(劉孔當) 少從吾遊，最契洽。……因倪侯請學於予。……乙酉舉於鄉，壬辰會試第三。是年，予與典春官，得君卷，以示同事，咸奇之。」⁴ 看來，劉孔當是在從伍氏家族習《春秋》受抵制之後改師同邑的鄒德溥，並最終以會試《春秋》經魁的成績獲得科舉成功。劉元卿講的這個「勵志」故事，很能引起我們的好奇：劉孔當為什麼要持之以恆地選擇《春秋》經作為自己參加科舉考試的本經？僅僅是出於一種憤悱嗎？

通常，明代士人在選擇以何種經典應科舉考試時，都會考慮家庭或地域的學術背景。劉孔當堅持選擇以《春秋》為本經，其實是因為明代江西安福縣的《春

¹ 劉孔當生卒年據劉元卿〈行狀〉。鄒德溥，《鄒太史文集》（清安成紹思堂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六，〈翰林院編修喜聞劉公墓誌銘〉亦認為劉孔當生於嘉靖丁巳 (1557)，卒於萬曆乙巳 (1605)，「享年四十有九」。《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歷履便覽》（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學生書局，1969〕，第 21 冊）載劉孔當履歷，稱其生於「乙丑 (1565) 十二月初一日」。「乙丑」很可能是劉孔當應科舉時所報的「官年」。關於官年，參見陳長文，〈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史學月刊》2006.11：44-48。劉元卿字調甫，號旋宇、瀟瀟，隆慶四年 (1570) 舉人。

²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 154 冊，據清咸豐二年重刻本影印），卷八，〈喜聞太史行狀〉，頁 29。

³ 《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歷履便覽》，頁 11569。

⁴ 鄒德溥，《鄒太史文集》卷六，頁 16。

秋》經在科舉考試中有特別大的優勢。黃景昉 (1596-1662)《國史唯疑》說：「安福《春秋》學，始劉球 (1392-1443)、吳節 (1397-1481) 二公，後進競師之，遂以其經名天下，迄今有安福《春秋》、黃岡《禮記》之目。」⁵ 黃景昉此語，於不經意間揭示了明代科舉體制下經學與地域的關係。作為一代國史的實錄，也有類似記載。《明憲宗實錄》為吳節所作小傳說：「節為人平易質直，信人不疑，為文如其為人。初治《春秋》學，與同學劉球齊名，又同入翰林。學《春秋》者多師二人，而節之徒尤眾。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遂擅名於天下。」⁶《國史唯疑》的議論，可能正是因此段小傳而發。明代關於安福士子擅長以《春秋》應試的議論還有不少。吳寬 (1435-1504) 在為弘治三年 (1490) 安福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而作的跋中說：「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⁷ 嘉靖間學者聶豹 (1487-1563) 則說：「今天下習舉子業專經《春秋》者，咸宗安成（安福縣古稱），謂安成獨得其宗決科之利也。」⁸ 可見，作為明代科舉史上的一種突出的現象，「安福《春秋》」引起了從國史修纂者到一般學者官僚的注意。這說明，劉孔當持之不懈地以《春秋》為本經，表面上是因為劉孔當有堅強的個人意志，背後卻是明代安福的《春秋》經在科舉考試上強大的專經優勢。

那麼，「安福《春秋》」所反映的一個地域集中地肄習某種經典以應科舉的現象，在明代是極特殊、極偶然的，還是普遍的呢？檢閱明人文集及地方志，可以發現不少類似現象及相關論述，如麻城和晉江的《春秋》、山陽和餘姚的《禮記》、無錫和莆田的《尚書》。明末麻城人李長庚 (1595 年進士) 說：「余邑《春秋》其世業也，習是經者十人而九。」另一位麻城人梅之煥 (1575-1641) 則

⁵ 黃景昉著，陳士楷、熊德基點校，《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三，頁 68。

⁶ 《明憲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二一七，「成化十七年七月辛卯」條，頁 3763。

⁷ 吳寬，《家藏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 1255 冊），卷五二，〈恭題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頁 12。王奎字國文，安福東鄉社背人，弘治三年 (1490) 進士，任江陰知縣，居鄉講學，辨析《春秋》疑義。參見清·姚濬昌修，周立瀛、趙廷愷纂，同治《安福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第 67 冊，據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卷一〇，〈人物·宦績〉，頁 49。

⁸ 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2 冊，據嘉靖四十三年吳鳳瑞刻隆慶六年印本影印），卷四，〈送王石泉輟講歸安成序〉，頁 9。

說：「古亭（麻城古稱）以治《春秋》特聞。」⁹ 無錫人高攀龍（1562-1626）則談及無錫士子擅長《尚書》：「不佞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自古志之。大江以南莫盛於吳，吳莫勝於蘇、常。蘇、常之專經而《書》者，莫盛於吾錫。故錫之先輩為道德，為勳猷，為氣節，為文章，出於《書》者常多。」¹⁰ 另一位無錫人安希范（1564-1621）在〈尚書揆一序〉中說：「吾邑經生業是經者什七，先達以是經取上第者，指不勝數，故江以南稱《尚書》家，言者雅推吾邑。」¹¹ 嘉興府據稱「十九治《尚書》」。¹² 對此類現象的觀察，吳寬的看法更全面。他說：「維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¹³ 這種一個地域集中地肄習某種經典以應科舉的現象，可稱之為明代科舉的「地域專經」。

在明代，科舉考試雖然號稱「五經」取士，但實際上考生只需要嫻熟一經，即士子所習之本經。洪武十七年（1384）科舉條例規定，考生「每場草卷、正卷各紙十二幅，首書姓名、年甲、籍貫、三代、本經。」¹⁴ 《明史·選舉志》載：「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¹⁵ 可見，「一經及第」才是明代士子取捷闈場的常態。清初李鄴嗣（1622-1680）說：「學者治一經、四

⁹ 李長庚，〈馮夢龍春秋衡庫序〉，鄭慶華修，潘頤福纂，光緒《麻城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卷四三，頁30；梅之煥，〈麟經古亭世業序〉，光緒《麻城縣志》卷四三，頁38。

¹⁰ 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2冊），卷九下，〈拂雲齋書經社草序〉，頁7。

¹¹ 安希范，《安我素天全堂集》（清乾隆間安吉校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二，頁11。

¹² 秦繼宗，《尚書彙解》（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貳輯第4冊，據萬曆刻本影印），〈賀燦然序〉，頁3。

¹³ 吳寬，《家藏集》卷三四，〈三辰堂記〉，頁17。浙江慈溪亦以《詩》見長。張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七載：「慈溪民風刁悍，宣德中，一令至，欲潛消其風。視事之日，進里老而謂曰：『汝等聞減門御史、破家縣令否？』一桂姓老子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但聞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頁312）

¹⁴ 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七七，〈科舉通例〉，頁448。

¹⁵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〇，〈選舉二〉，頁1694。無錫顧憲成（1550-1612）萬曆四年鄉試墨卷卷首楷書寫「習《書》經」，參見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明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69。

書外，即能作制義，中甲乙科。……今日擁蓋食梁肉，炤耀里門，俱治一經四書人也。」¹⁶ 考官安排及錄取名額的配置，亦分經進行。陳循（1385-1462）談到正統元年（1436）會試分經取士的名額分配：「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四方分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南方《書》卷備百人之選者，止十有八人。」¹⁷ 考試之前，有時主考官還會對同考官就各經的「錄取標準」作一番強調。例如，呂柟（1479-1542）為某鄉試主考代作的〈正德十四年（1519）陝西鄉試錄序〉中說：「某及某官某人謬應陝西考試官。……初，某之語諸有司也曰：『某官某人考《易》，深貴顯，遠貴近，虛貴實，異貴經，小貴大；某官某人考《書》，雜而不理非精也，同而不殊非一也；某官某人考《詩》，成心忘者其辭沖，隘心去者其辭遂，妬心橫者其辭險；某官某人考《春秋》，正傳以發經為上士，假傳以求經者為中士，泥傳而廢經者為下士，下士勿取；某官某人考《禮記》，迂者陳古而整宜，蕩者徇時而忘舊，迂則不行，蕩則非止；《四書》者率此者也，論者以此議者也，策者以此測者也，詔誥表判者以此準者也。』」¹⁸ 至晚明，會試預錄取的名額甚至分配到各經房，如遇房中優秀答卷太多，雖然可以在同經的其他房調劑，但不是很常見，因為會引起猜疑。¹⁹ 因此，鄉會試雖皆考三場，但從應考、分房到閱卷，似乎主要是圍繞第一場的經義而展開，而經義在科舉考試中的份量亦由此可見。考試中，經義又最重。嘉靖七年湖廣鄉試考試

¹⁶ 李鄴嗣，《杲堂詩文鈔》（收入《四明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06〕，第29冊），文鈔卷五，〈戒庵先生藏銘〉，頁36。

¹⁷ 陳循，《芳洲先生文集》（明萬曆四十六年陳以躍刻本，南昌：江西省圖書館藏），卷三，〈送蕭教諭赴長洲序〉，頁43-44。《正統元年會試錄》（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2010〕）記載表明該科共錄取一百人：《尚書》三十人，南北中分別為十八、十、二人；《詩》二十六人，南北中分別為十六、八、二人；《易》十八人，南北中分別為十、六、二人；《禮記》十五人，南北中分別為八、四、三人；《春秋》十一人，南北中分別為八、二、一人。按，下引科舉錄凡未特別註明者，皆錄自《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不再註明。

¹⁸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0-61冊，據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影印），卷二，頁48。

¹⁹ 楊嗣昌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參加會試，本房主考為朱世守，「正卷因中額已足」，借用《書》四房（房考官張之紀）的名額。此事引起其他考生不滿，議論紛紛。參見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集部第70冊，據舊鈔本影印），卷五七，〈投繳硃卷揭〉，頁10。

官吳龍說：「聖祖高皇帝繼天立極，用夏變夷，以經術造天下之士，雖諸子史無不學，而經為重，設科取士，雖論策諸文無不校而經義為主。」²⁰ 清初顧炎武 (1613-1682) 說：「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²¹ 可見，頭場最重，而頭場又更重經義。明人沈士端 (?-1642) 說：「往予聞諸長老言，凡朱衣入闈，閱《春秋》試牘，必先經而後四書義，經義不佳，四書雖爛若披錦不售也。」²² 雖然學者在明代科舉四書義與經義孰輕孰重問題上有不同理解，²³ 但分房閱卷、分經取士，至少在形式上反映了經義的重要性，故明代學者多強調士人以一經取功名。姚鏌 (1465-1538) 說：「偏陬下邑之士，皆知占一經自奮以求齒上國。」²⁴ 管大勳 (1565 年進士) 云：「皇祖御極，飭學官弟子各占一經，四書則兼通焉。」²⁵

如何選擇本經，對有些士人而言是偶然的。李舜臣 (1499-1559) 曾談他幼年選擇本經的過程，說：「余年十二三時，先大夫議所讀經。憶為三字入覆皿中，默禱於庭，曰易、詩、書，惟吾所當。為手焚香，探得『書』字。余蓋用《書》叨取進士。」²⁶ 可見，李舜臣幼年選擇本經時採取的是隨機拈闔的方式。此外，為增加成功機會，諸子分習數經的做法也比較常見。彭華說蓬溪教諭楊子淵令五

²⁰ 《嘉靖七年戊子科湖廣鄉試錄》，〈後序〉，頁 2。

²¹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一六，「三場」條，頁 943-944。

²² 沈士端，〈麟旨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頁 347。

²³ 周啟榮 (Chow Kai-wing)，〈為功名寫作：晚明的科舉考試、出版印刷與思想變遷〉，張聰、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29；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也認為，從一三八四年起，首場即重「四書」輕「五經」，參見〈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氏著，《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58。

²⁴ 姚鏌，《東泉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6 冊，據明嘉靖刻清修本影印），卷一，〈福建鄉試錄序〉，頁 50。

²⁵ 管大勳，《光祿集》（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 18 冊，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卷三，〈明經書院條約〉，頁 55。

²⁶ 李舜臣，《愚谷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3 冊），卷六，〈四經讀自序〉，頁 17。據《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載，第二甲第一名李舜臣，「貫山東青州府樂安縣，民籍，國子生，治《書》經，字懋欽，行二，年二十五。……山東鄉試第六十七名，會試第一名」。（頁 8）

子分習五經，皆有成就。²⁷ 黎淳 (1423-1492)〈叢桂堂詩序〉記載：「子淵產五丈夫子：長晉，治《春秋》，隱為義官；次紳，治《易》，領庚午鄉薦，知萬縣；次經，治《書》，領癸酉鄉薦，教諭通江；次緯，治《禮記》，領庚午鄉薦，舉甲戌進士，屢遷廣東參政；次繹，治《詩》，領丙子鄉薦，舉庚辰進士，歷陞兵部郎中。五子分治五經，而四登鄉榜，二擢甲科。」²⁸ 湖廣石首人黃貴 (1405-1466) 雖從邑人楊溥 (1372-1446) 學《尚書》，其諸子則分習五經，「長用宣，治《書》，領庚午鄉薦，授台州府同知；次用宜，治《易》，領乙酉鄉薦；次用寧，治《春秋》；次用純，治《詩》；次用端，治《禮記》」。²⁹ 但是，對大多數士子而言，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在選擇本經時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家族或家庭中是否有習某種經的傳統？是否能夠在鄰近的地區找到合適的老師？因此，士子希望獲得科舉成功，其選擇本經時就絕不能盲目，而通常要考慮家庭及地域的科舉風氣。久之，便形成了某個地域範圍內士子研習同一部經典以應科舉的傳統。這不僅在科舉發達地區如此，即便在科舉次發達地區亦一樣。清初順治年間山東滕縣知縣吳起鳳（1655 年進士）發現，「初，滕邑應舉者惟習《周易》」。³⁰ 這表明，可能明代山東滕縣士子絕大多數以《周易》應試。明代湖廣華容縣的科舉並不是很發達，僅進士三十二人，³¹ 然中第者多治《尚書》經。邑人黎淳說：「當其群英講學，雖五經並授，然惟伏氏一經（指《尚書》）乃獨盛發於吾容庠也。」³² 可見，「地域專經」並不限於科舉發達地區，也見於科舉不發達地區，是明代科舉的一種普遍現象。

至於「地域專經」的概念，則是受日本學者鶴成久章「專經」（即「本經」）概念的啟發。在〈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一文中，鶴成久章以《鄉試錄》為材料研究明代各省的「專經」現象，討論各省鄉試「房」的設置及其

²⁷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收入《明人文集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 11 冊，據明弘治十六年安福彭氏刻本影印），卷二，〈叢桂堂銘〉，頁 144。

²⁸ 黎淳，《黎文僖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330 冊，據明嘉靖三十五年陳甘雨刻本影印），卷一一，頁 35。

²⁹ 黎淳，《黎文僖公集》卷一二，〈國子監助教黃成美先生墓誌銘〉，頁 32-34。

³⁰ 楊念先修纂，民國《陽城縣鄉土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華北地方第 74 號，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頁 16。

³¹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 269。

³² 黎淳，《黎文僖公集》卷一〇，〈送夏時秀掌教銅梁序〉，頁 15。

變化等問題，³³ 但未涉及「專經」的社會背景。吳宣德最近則研究了明代會試之中各省的專經情況，並推論說：「可以推想，各直省內部的經書分布也是朝某些府州縣集中，並且同樣也存在差異。」³⁴ 只是，吳先生並未沿此推論進行下一步的研究。不過，鶴成久章〈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關於陽明學成立的一個背景〉一文，開始切入具體的「地域專經」現象，指出餘姚是明代《禮記》盛行的地方：成化元年（1465）到弘治十七年（1504）的一百二十七名舉人，八十六人以《禮記》出身；明代餘姚《禮記》學者有鄉試經魁三十四人，會試經魁十四人；謝遷（1449-1531）、王守仁（1472-1529）等都是數代以《禮記》為家學。只是，該文主要談餘姚《禮記》與王守仁《大學古本》之間的聯繫，對餘姚《禮記》經在科舉中的表現並沒有作更深入的分析。³⁵ 此外，張藝曦曾談到：「安福《春秋》學與浙江會稽、湖北麻城並稱為全國三大《春秋》學中心」。³⁶ 張育齊則探討過湖北麻城縣的《春秋》學在科舉上的發達。³⁷ 本文通過安福《春秋》學的個案，來解剖明代科舉文化中的「地域專經」現象，具體探究：安福《春秋》的傳統是怎麼形成的？何時形成？安福的《春秋》經在科舉上的優勢是如何維繫的？最終的結局又如何？

二・明代科舉錄中的安福《春秋》

在明代科舉的「地域專經」現象中，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的《春秋》經是最有

³³ 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52（2000）：208-222。

³⁴ 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7.1（2011）：99-111。按，得益於近年《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的出版，利用會試錄對明代會試分經情況的研究漸多，代表性論文除吳宣德文外，還有汪維真，〈明清會試十八房源流考〉，《史學月刊》2011.12：36-53。

³⁵ 鶴成久章，〈明代餘姚の『禮記』學と王守仁——陽明學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東方學》111（2006）；中文譯文見〈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關於陽明學成立的一個背景〉，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356-367。

³⁶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頁216, 219。

³⁷ 張育齊，〈思想人物與地方社會的交涉——以晚明湖北麻城、黃安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37-42。

代表性的。安福《春秋》的聲譽，是合數種因素而形成的：（一）安福縣科舉發達。據學者統計，明代安福縣的進士、舉人分別為二百五十二、七百一十八人，居吉安府九邑之冠，³⁸ 而吉安府又是明代科舉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以縣域論，按照錢茂偉、吳宣德的統計，安福縣進士人數僅次莆田、晉江、餘姚、華亭、鄞縣、閩縣、武進、南昌、慈溪等縣，排在第十名。³⁹（二）《春秋》經的孤經性質。明代士子以《春秋》、《禮記》為本經者少，兩經有「孤經」之喻，而肄習者因此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鶴成久章說：「考生的選擇傾嚮，雖然能根據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發現不少差異，然而一貫被敬而遠之的則基本上是《禮記》和《春秋》。由於選擇這兩部書的考生數量很少，所以明清時代便稱其為『孤經』。」⁴⁰ 這大概也正是黃景昉《國史唯疑》中為何只強調安福《春秋》和黃岡《禮記》而不言《尚書》、《詩》、《易》的原因。科舉發達，意味著進士、舉人的基數較大，而且還相對集中於肄習者較少的孤經上，所以才顯得特別地突出。即便與其他擅長《春秋》的麻城、晉江、淳安等縣比較，明代安福縣的《春秋》經仍有不小的優勢，有科舉錄的數據為證。

本文利用的科舉錄資料主要有兩種：《會試錄》和《登科錄》。通常情況下，會試中式後參加殿試只是重排名次，少有黜落。⁴¹ 不過，士子可能在會試中式後因家庭或個人的原因而沒有在同年參加殿試。因此，《會試錄》與《登科錄》兩種資料雖然關係密切，但又有差別，應分開進行考察，以免混亂。在考察安福《春秋》經士子的科舉中式比率問題上，主要利用《會試錄》來考察以下三個問題：（一）明代以《春秋》經會試中式者，於五經之中大概能佔到多大的比率？（二）安福縣的《春秋》經學者在歷科會試中的錄取人數及其比率是多少？（三）與其他擅長《春秋》經的地域相比，安福是不是最突出的？

通過對洪武四年（1371）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間四十六科《會試錄》的統計可知，四十六科會試中，以《春秋》經中式者 1,107 人，佔中式總人數

³⁸ 宗韻，《明代家族上行流動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229。

³⁹ 錢茂偉統計明代安福進士為 204 人。吳宣德按籍、貫分別統計，籍總計為 204 人，貫總計為 235 人，籍貫同者 201 人。參見：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193；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頁 81, 264。

⁴⁰ 鶴成久章，〈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頁 356。

⁴¹ 明代殿試對會試中式者有過黜落的只有兩科，即洪武二十一年（1388）及萬曆三十八年（1610），參見郭培貴，《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23。

(12,860 人)的 8.6%。⁴² 如果考慮其中四科《會試錄》因缺頁而造成資料不完整的因素，⁴³ 會試中以《春秋》經中式的人數和比率可能會再高一些。其中，明初以《春秋》經會試中式的人數比率最高。洪武四年 (1371)，以《春秋》經中式者有 40 人，佔該科會試中式總人數 (120 人) 的三分之一；建文二年 (1400) 以《春秋》經中式者 17 人，比率為 15.45% 左右 (參見文後表一)。明初《春秋》經錄取的高比率，既可能與明初科舉政策尚未完全定型有關，也可能與明初《春秋》學發達有關。明初儒臣劉基 (1311-1375)、宋濂 (1310-1381)、朱升 (1299-1370)、汪克寬 (1301-1372)、趙汸 (1319-1369)、張以寧 (1301-1370) 等人皆以《春秋》名。劉基在元朝末年還撰有「科舉經義體裁」的《春秋明經》。⁴⁴ 洪武二十九年孔廟祭祀黜揚雄，進董仲舒，也可能反映了朱元璋本人及明初社會對《春秋》的重視。⁴⁵ 然而，《春秋》之難學，使應考生儒對《春秋》敬而遠之。明初學者已深感《春秋》之難，以「其歲月先後難記」、「諸國之事雜見」。⁴⁶ 晚明宋儀望 (1514-1578) 認為，《春秋》、《禮記》二經在考試中「題目互變、書義煩多」，故誦習者少。⁴⁷ 耿定向 (1524-1596) 之姪耿汝思 (1575-?) 在天啟四年 (1624) 談到《春秋》介乎經史的特點而帶來的肄習之難：「《春秋》經而

⁴² 四十六科《會試錄》主要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另有《成化十一年會試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第 116 冊，據明成化刻本影印)、《正德三年會試錄》(明正德三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正德十五年會試錄》(明正德十五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等三種。

⁴³ 中式舉人名錄有缺頁的四科《會試錄》分別為：正統十三年、天順元年、弘治十八年、正德十五年。

⁴⁴ 朱鴻林，〈劉基《春秋明經》的著作年代問題〉，《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4：4-12。

⁴⁵ 按，藍德璋 (John D. Langlois, Jr.) 認為，元代刑律缺失，士人對於經學反加重視，對作為「刑書」的《春秋》尤為重視。參見 John D. Langlois, Jr., "Law, statecraft,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uan political thought," in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 Hok-lam Chan and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89-152.

⁴⁶ 徐鉉，《皇明名臣琬琰錄》(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 1 冊)，卷八，鄭楷〈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皇太子標〉：「太子事濂最謹，潛心六經，讀《左氏傳》，苦諸國之事雜見。」(頁 1189)

⁴⁷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6 冊，據清道光二十二年宋氏中和堂刻本影印)，續刻卷二，〈學政第三〉，頁 34。

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是以難也。」⁴⁸ 麻城人李長庚認為學習《春秋》有三難：（一）褒貶刑賞在一字中，或在言外，而變例雜出；（二）專用胡氏，以功令所在，不得不抑心意以從之；（三）考試中搭題出處隨意，考生常慮題之不習。⁴⁹ 而且，正如鄒德溥所言，做《春秋》經義文字還須精古文。他說：「《春秋》以主斷，故頗得縱才而傳古，然士人不素習先秦西京裁，卒欲抗而之古不能也。」⁵⁰ 職此之故，士人多不欲以《春秋》為本經，而《春秋》亦遂成孤經。晚至隆慶年間，臨江知府管大勳在勸諭諸生的〈明經書院條約〉中尚說：「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不可測。」⁵¹ 明代中期的出版市場亦反映了這一點。蘇州府昆山縣人葉盛（1420-1474）攻舉子業時，「求市五經正文於書肆中，惟《春秋》、《禮記》卒不可得，每以為欠事」。⁵² 到十五世紀末，距明代科舉考試開展已過百年，陝西西安府文化較發達的高陵縣還從未有肄業《春秋》和《禮記》的學子。⁵³ 在會試中，《詩》、《易》、《書》一般為四房或五房，而《禮記》和《春秋》一般為一至兩房。⁵⁴ 鄉試以《春秋》、《禮記》應考者更少於其他三種經典。⁵⁵ 嘉靖十九年（1540），江西瑞金知縣王鈺將儒

⁴⁸ 耿汝思，〈春秋愍渡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頁336。

⁴⁹ 李長庚，〈馮夢龍春秋衡庫序〉，光緒《麻城縣志》卷四三，頁30-32。

⁵⁰ 鄒德溥，〈鄒太史文集〉卷二，〈己丑春秋同門稿序〉，頁20-21。

⁵¹ 管大勳，〈光祿集〉卷三，〈明經書院條約〉，頁55。

⁵² 葉盛，〈菴竹堂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5冊，據清初鈔本影印），卷七，〈書聖賢經訓後〉，頁18。

⁵³ 呂柟纂修，嘉靖《高陵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7〕，第6冊，據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清光緒十年刻本影印），卷六，〈人物〉：「周紹，字克述……舉弘治甲子（1504）鄉試。……初縣無《春秋》、《禮記》，雖鄰封求二書無所得也。紹乃身走武功諸處購求獲之。」（頁9）

⁵⁴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一六，「十八房」條，頁935。關於明代會試各經房的增減及十八房制形成後房的設置的波動，可參見汪維真，〈明清會試十八房源流考〉。

⁵⁵ 明代鄉試中房的設立因地域、時間不同而差異較大。《易》有只設一房者；嘉靖十六年（1537）貴州鄉試不設《詩》房；萬曆元年（1573）貴州鄉試不設《書》房。不過，不設《春秋》、《禮記》房的情況在鄉試中最多，且不限於最偏遠的貴州鄉試：萬曆七年河南、嘉靖四十三年四川、嘉靖十年雲貴、萬曆元年貴州鄉試皆不設《春秋》房；成化元年（1465）、弘治二年（1489）山東鄉試皆不設《禮記》房；嘉靖十六年貴州鄉試合《易》與《春秋》為一房；萬曆元年貴州鄉試合《易》與《禮記》為一房。參見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頁212-213。

學號房移建於「鄉校」，包括「易經號房十間、書經號房十間、詩經號房八間」，「延請師儒以司教事」，卻無《春秋》和《禮記》號房，表明瑞金縣士子以《春秋》、《禮記》為本經者絕少。⁵⁶ 甚至明代皇帝的講筵亦「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至神宗萬曆朝方命講《禮記》，至崇禎朝始講《春秋》。⁵⁷

隨著應考人數相對《詩》、《書》、《易》應考人數的比率不斷下降，《春秋》經佔會試錄取五經總人數的比率也在下降。宣德二年（1427）至成化八年（1472），《春秋》經的錄取比率一直佔到五經的 10%以上；成化十一年始，《春秋》經錄取降到 10%以下；從成化十七年起，《春秋》經佔會試中式五經總人數的比率就再也沒有超過 9%，而弘治、正德年間的比率最低，大約在 6%到 7%之間（參見表一、圖一）。《進士登科錄》所反映出來的趨勢也大略相近：從進士數量看，成化八年之前，《春秋》經進士的人數絕大部分佔到該科進士總人數的 10%以上，之後都在 10%以下（參見表三）。表面看，作為五經之一，《春秋》經僅佔五經錄取總人數的 8.6%，其比率似乎較低。但是，如果考慮到以《春秋》經應考的士子人數可能遠低於《詩》、《書》、《易》三經，這個比率應屬正常，且《禮記》經的會試錄取人數佔總人數的比率也與《春秋》相近，在 8%左右。⁵⁸ 汪維真的統計顯示，十六世紀以後，各經在錄取總人數中的比率，大約《詩》35%，《易》30%，《書》20%，《春秋》、《禮記》均 8%左右。⁵⁹ 在鄉試中，以江西鄉試而論，《春秋》經在錄取總人數中平均佔 7.8%（參見表四）。由於我們無法掌握報考各經的具體人數，很難確定以《春秋》經應考的士子在科舉中的優勢到底有多大。⁶⁰ 但是，嘉靖年間池州府學者李呈祥（1495-1554）說：

⁵⁶ 趙勳修，林有年纂，嘉靖《瑞金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第 40 冊，據明隆慶刻本影印），卷三，〈學校〉，頁 2, 4。

⁵⁷ 張廷玉，《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傳〉，頁 6498；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5 冊），卷三五，〈文文肅公傳〉，頁 10。

⁵⁸ 鶴成久章統計過兩科浙江鄉試和兩科會試中《禮記》經的錄取名額。兩科浙江鄉試中《禮記》一經的錄取比率都是 10%（一四八〇年與一四九二年），兩科會試《禮記》一經的錄取比率分別為 8.3%（一四八一年）和 7.3%（一四九九年），見氏著，〈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頁 357。

⁵⁹ 汪維真，〈明清會試十八房源流考〉，頁 42-43。

⁶⁰ 科舉錄材料中通常有對考試人數的大概記載，但多不精確，更無法推算各經的報考人數。前引陳循所稱正統元年會試「每經七取其一」的比率其實也不精確，並不足以反推當時報考各經的考生人數。如以陳循的說法反推，錄取一百人，則正統元年會試人數應為七百

「今天下士子習《春秋》者，百無一二人；天下府州縣習《春秋》者，百無一二處。原其故，只因命題試士必欲屬辭比事，則試官巧立主意，變態無窮，士子難於比擬揣度，是以畏其難而莫之肯習也。……而是經終為孤經也。」⁶¹「百無一二人」雖是概說，然而，以「百無一二人」的習經人數，在鄉會試錄取五經的總人數中卻常能佔到 7%至 8%，其優勢還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為什麼還有士子不畏《春秋》之難習，而極力去克服書籍、師資方面的局限，選擇以《春秋》作為本經的原因。隆慶年間，福建提學副使宋儀望督勸諸生肄習《春秋》、《禮記》，說：「《春秋》、《禮記》二經，海內誦習者少。……但有精專二經，立為主司所知，非若《易》、《詩》率以數十卷乃中式一卷。」⁶²可見，與《易》、《詩》等經的情況相比，《春秋》和《禮記》經肄習雖難，但一旦入門後在科舉考試中的錄取情況反而要好一些，而且有作為「孤經」肄習者「立為主司所知」的優勢。

在人數相對較少的《春秋》經應試者中，安福的《春秋》經學者的科舉成績是令人震撼的。對四十六科《會試錄》所載中式舉人按縣一級的地域分佈進行統計後發現：四十六科《會試錄》所載 1,107 位以《春秋》經中式者，廣泛分佈於兩京、十三布政司，散佈到四百一十多個州縣衛所，甚至還有高麗及交趾的中式者。其中，《春秋》經會試中式者在十人以上的縣有十四個：江西安福縣（82 人）、湖廣麻城縣（42 人）、福建閩縣（33 人）、南直隸歙縣（31 人）、浙江淳安縣（25 人）、浙江臨海縣（23 人）、南直隸祁門縣（18 人）、浙江會稽縣（17 人）、河南羅山縣（16 人）、廣東海陽縣（15 人）、福建晉江縣（13 人）、四川遂寧縣（13 人）、廣東東莞縣（13 人）、南直隸華亭縣（10 人）

人，然而王直〈正統元年會試錄序〉（載《正統元年會試錄》）中卻稱該科「會試禮部者凡千人」。因此，陳循所謂的「每經七取其一」的錄取比率，應該只是一個大概的比率。其次，有些零星的材料，可以提供報考某種經的考生人數，如宣德五年同考試官楊壽夫在考卷批閱中提到該科《春秋》考卷二百餘人，最後錄取十一人，約二十卷取一人，參見《宣德五年會試錄》，頁 25。但是，這種材料太少見。再次，鄉會試中各經的房數雖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一定完整反映考生人數的差別。換言之，僅設一房的《春秋》經考生的數量，未必是設四房或五房的《詩經》考生人數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有可能更少或更多。因此，以房數的差別來推定考生人數的差異不一定準確。

⁶¹ 李呈祥，《古源山人日錄》（收入《國家珍貴古籍選刊》〔揚州：廣陵書社，2009〕，第 2 冊，據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敬之、李謙然刻本影印），卷八，頁 6。

⁶²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續集》卷二，〈學政〉，頁 34。

(參見表二)。⁶³ 安福縣的 82 人，佔到四十六科會試以《春秋》經中式總人數的 7.4%，是排名第二的麻城縣 42 人的近兩倍；六十四科《登科錄》的數據也表明，安福的 99 名《春秋》經進士佔 1,409 名《春秋》經進士人數的 7.03%。可見，安福縣《春秋》經的優勢很明顯。如果說與麻城比較而形成的超常優勢，或是因為麻城明代進士總人數（93 人）不及安福，⁶⁴ 那麼，進士總人數比安福多的晉江、閩縣、華亭等縣，其《春秋》經進士的人數反而比安福縣更少，就更能反襯安福《春秋》經的發達。而且，在四十六科會試中，安福縣僅九科沒有《春秋》經的中式者，其以《春秋》經獲得科舉成功具有極強的延續性（參見表二）。除了人數及延續性的優勢以外，安福《春秋》經學者在會試中的成功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四十六科會試中，安福《春秋》經學者的成績很突出，作為會試《春秋》經魁的次數多達九次，即宣德五年（1430）吳節、宣德八年李紹、正統十三年（1448）彭時、景泰五年（1454）彭華、天順元年（1457）彭彥充、天順七年伍希淵、成化十七年（1481）歐陽旦、正德六年（1511）鄒守益、嘉靖八年（1529）王學益。如果加上未計入以上四十六科之中的萬曆二十年（1592）《春秋》經魁劉孔當，可知的安福籍會試《春秋》經魁至少在十人以上。而且，彭華、鄒守益還分別是該科會試的會元，彭時是正統十三年的狀元。

⁶³ 限於篇幅，本文未能將四十六科《春秋》經會試中式者的地域分佈附見。此 1,107 人的地域分佈以及各省排名前列的州縣大致如下：（一）浙江 158 人，其中淳安 25 人，臨海 23 人，會稽 17 人，仁和 9 人，餘姚、烏程各 7 人；（二）江西 143 人，其中安福 82 人，南城 6 人，豐城、新喻各 5 人，清江、新建各 4 人；（三）南直隸 142 人，其中歙縣 31 人，祁門 18 人，華亭 10 人，長洲 7 人，婺源、上海各 6 人；（四）湖廣 78 人，其中麻城 42 人，蘄水 4 人，黃岡、孝感、武陵各 3 人；（五）福建 98 人，其中閩縣 33 人，晉江 13 人，侯官 9 人，福清 8 人；（六）廣東 38 人，其中海陽 15 人，東莞 13 人；（七）四川 76 人，其中遂寧 13 人，內江 8 人，江津 7 人，巴縣、富順各 6 人；（八）河南 86 人，其中羅山 16 人，光山 8 人，光州、汝陽、西平、固始各 5 人；（九）山西 56 人，其中遼州 7 人，高平 5 人，榆社 4 人，沁水 3 人；（十）山東 54 人，其中歷城 6 人，壽張、堂邑各 5 人，德州 4 人；（十一）北直隸 66 人，其中大興 6 人，定興 4 人；（十二）雲南 9 人，貴州 6 人，廣西 12 人，均無特別突出的地域。另外，散佈諸衛所的情況不少，而錦衣衛籍者有 8 人，交趾、高麗還各有 1 人。述此，以見明代擅長《春秋》經的縣域。

⁶⁴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頁 268；按，王楚平，《黃岡歷代進士考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認為明代麻城進士人數為 106 位，見頁 250-259；羅威廉的統計則是 110 位進士，見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8.

(二) 四十三科《會試錄》所錄的《春秋》經義程文，⁶⁵ 共著錄了 77 位作者，安福作者有 13 人，除前述的九科經魁之外，還包括景泰二年的劉宣、天順七年的張敷華、正德十二年的歐陽必進以及隆慶五年（1571）的劉臺（參見表一）。

(三) 正德六年會試，以《春秋》經中式者共 21 人，安福縣的《春秋》經學者為 8 人，即鄒守益、伍箕、王璽、劉廷簾、李校、劉提、伍希儒、張鰲山，佔近百分之四十。這種現象確實極偶然，但是反映了安福的《春秋》經學者在科舉考試中的巨大優勢。

(四) 如果說安福《春秋》學在全國性的會試中，多少還遭遇到來自麻城、閩縣、淳安等縣的挑戰，那麼，在江西鄉試中，安福縣在《春秋》經上的統治力更強大。對二十二科江西鄉試錄進行統計後發現：二十二科鄉試共產生了 172 名以《春秋》為本經的舉人，其中安福縣 98 人，佔 57%，而且其中十七科安福縣籍的《春秋》經舉人比率都在 50% 以上，最高的比率達 100%，如弘治十四年（1501）江西鄉試錄取的八名《春秋》經舉人即全部來自安福縣。⁶⁶ 可見，在江西鄉試中，安福縣的《春秋》經士子至少壟斷一半以上《春秋》房的舉人名額。而且，在二十二科鄉試中，有十四科《春秋》經魁出自安福縣（參見表四）。⁶⁷ 可見，無論會試還是鄉試，無論數量還是名次，安福縣士子在《春秋》經上的成績都極為優異。

強大的科舉競爭力，反過來刺激了安福學者對《春秋》經的熱情。對六十二科《進士登科錄》的統計表明，安福縣六十二科中以《春秋》經中進士者 99 人，佔這六十二科的安福縣進士總人數（197 人）的 50% 以上（參見表三）。將四十六科會試中安福《春秋》經中式者（82 人）與這四十六科的安福縣進士總人數（166 人）相比較，比率為 49%，接近一半（參見表二）。⁶⁸ 參照之前提到的《春

⁶⁵ 四十六科《會試錄》中，《洪武四年（1371）會試錄》無程文，以其時尚未有刻印舉人程文之舉。萬曆二十九（1601）、四十七年兩科《會試錄》雖有程文，但未錄程文作者名氏。

⁶⁶ 在二十二科江西《鄉試錄》中，二十科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另外兩科分別是《嘉靖三十七年江西鄉試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13 冊）和《天啟七年江西鄉試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22 冊）。

⁶⁷ 除表四所列十四科經魁之外，自歷科《會試錄》看，吳節、劉彝、劉鈺、彭彥充、歐陽旦、伍符、路麟、伍希儒等八人在江西鄉試中的名次都在前五名，當為各科鄉試《春秋》經魁。另，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載：「朱國楹，號季銘，南鄉大橋人，與近里王績燦文名並噪。萬曆乙卯（1615）王以《尚書》領元，國楹魁《春秋》，時稱西江雙穀。」以此論，安福縣可知的江西鄉試《春秋》經魁至少在二十三人以上。

⁶⁸ 在《春秋》經進士人數較多的縣之中，專經程度更高的有湖廣麻城縣、河南羅山縣、四川遂寧縣、浙江淳安縣與南直隸祁門縣。麻城縣和羅山縣有 84% 的進士是以《春秋》為本

陳時龍

秋》經一般在會試五經錄取中平均佔 8.6%的比例，則安福縣進士中 50%的人以《春秋》為本經，清楚表明安福士子在五經中極大地偏重於《春秋》了。舉人方面的比率約略相近。對二十二科江西鄉試的考察表明，以《春秋》為本經的安福籍舉人 98 人，佔到這二十二科安福縣舉人總數（210 人）的 46.7%（參見表四）。這說明，接近一半的安福縣進士或舉人是以《春秋》為本經。在生員、童生的階段，安福的《春秋》經肄習者所佔的比率可能更高一些。麻城人梅之煥（1596-?）在《春秋因是·凡例》中說：「麻城、安福諸邑，習《春秋》者十有八九。」⁶⁹

清楚安福《春秋》在明代科舉考試中具有如此明顯的優勢，肄習《春秋》的風氣又是如此盛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劉孔當要不折不撓地以《春秋》為本經了。問題是，安福縣怎麼就會在五經之中選擇了《春秋》經呢？安福士子在《春秋》經上的科舉優勢，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的呢？

三·安福《春秋》學的源流

有一種傳說稱安福縣的《春秋》學淵源於湖廣黃州府的麻城縣。長洲人李惠時〈安福得麻城麟經科第之源〉一文記載：「成化年間，有鮑先生諱時，變衣冠與姓名至麻城，聞一僧舍有傳《春秋》者，投身於僧為司爨。每先生講經時，輒提茶一壺，徧送諸生，因得竊聞之。數月而畢，眾悉歸，先生尚留意以數月。蒙司爨送茶，入其寢處候之。鮑適外出，先生見其床邊几上有一硯，取觀之，忽見《春秋》文，訝曰：『此必盜傳經者也。』鮑適至，張皇失措。先生曰：『幸吾一人在。若諸生在館，子無歸路矣。尚有口訣傳爾，可速去，毋遲。』鮑還至安福，授衣鉢，但竹坡公《春秋》中解元。先祖登先生堂，拜曰：『解元吳節中經學，老師傳言，不敢忘本也。』鮑先生曰：『雖藉先生力，還要為子賢。』（先祖）後中會魁第二，官至祭酒、侍講學士。先祖又傳於彭文恪公，狀元宰相。其後鄒泗山先生以《春秋》名海內。……今安福《春秋》每科必二、三人。述此，見前輩傳經不憚艱苦至此。師可忽乎哉！」⁷⁰

經，而遂寧縣、淳安縣、祁門縣依次為 81%、69%、56%，參見表二。這也表明，在一些科舉次發達地區，其地域專經的程度可能更高。

⁶⁹ 梅之煥，《春秋因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28 冊，據清初金閭孝友堂刻本影印），〈凡例〉，頁 8。

⁷⁰ 光緒《麻城縣志》卷四三上，〈藝文·序〉，頁 29。鄭重修，余晉芳纂，民國《麻城縣志

李惠時生平無考，自文中內容推測，似是明代曾官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的李時勉的後人。故事模仿了禪宗五祖弘忍與六祖惠能間的傳經故事，但整個故事經不起考證。首先，「竹坡公」即宣德四年（1429）江西解元、次年會試第二名的吳節，比所謂鮑時「盜經」發生的時間——成化年間（1465-1487）——要早數十年。其次，鮑時確有其人，但不是吳節的老師。鮑時原籍湖廣武昌府咸寧縣，隨父親鮑琮移居安福。同治《咸寧縣志》記載：「鮑時，字時博，治《春秋》，鮑琮子，中癸卯（1423）鄉試第五，永樂甲辰（1424）登進士第。……子孫今為安福人。」⁷¹ 實際上，傳授吳節《春秋》學的是鮑時的父親鮑琮（或作鮑宗、鮑崇），而不是鮑時。這樣年代倒置、父子相混的錯誤，表明此種傳說的不經之處。不過，背後卻隱含了一些真實信息以及值得探討的動機。早在明初，麻城縣已有擅長《春秋》經的學者，如吳山、鄒來學（1402-1457）。⁷² 明代麻城縣以《春秋》經中進士的人數也僅次於安福（參見表二）。因此，安福《春秋》源於麻城之說可能反映了麻城、安福兩縣在《春秋》經上的競爭，所謂「海內以麟經相雄長者數處，安（福）與麻（城）狎主齋盟焉」。⁷³ 在競爭不敵的情況下，詭稱對方學問源出於己，是一種常見的策略。以這樣的虛構故事壓低對手抬高自己，大概正是這一傳說出籠的動機。因此，儘管此文署名「長洲人李惠時」，但僅見於《麻城縣志》，則這個故事背後的動機不也是很清楚嗎？如果要問，安福《春秋》學是否「盜」自麻城？答案是否定的。相反，麻城縣《春秋》經肄習者鄒來學，還曾經從學於安福的吳節，⁷⁴ 而這一點卻是麻城縣的地方志所不願意提及的。不過，鮑時盜經的傳說揭露了另外一種真實，即明代安福縣專經《春秋》的

前編》（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一五，〈雜誌·軼事〉亦載：「明代邑人捷春秋聞者，多以麟經顯，外省有不遠千里來麻就益者。……江西安福相傳得麻城麟經訣。」（頁26）

⁷¹ 陳怡等修，雷以緘纂，同治《咸寧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27冊，據清同治五年刻本影印），卷六，頁15。

⁷² 吳山，字仲安，洪武初舉明經，歷任合州學正，內江、青城知縣，博學多聞，尤精《春秋》，鄒來學輩皆出其門。鄒來學，字時敏，以《春秋》中永樂庚子（1420）鄉選，宣德癸丑（1433）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參見拙文，〈天一閣藏《明史稿·鄒來學傳》校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大東文化大學編，《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384-401。

⁷³ 張希良，〈會芳園春秋新藝序〉，光緒《麻城縣志》卷四五，頁68。

⁷⁴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七，〈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行狀〉，頁555。

形成一方面是根柢於本地長期積累的學術優勢，另一方面卻也有賴於像鮑琮那樣的外來學術資源。⁷⁵

吉安府自宋元以來即有悠久的經學傳統。萬曆《吉安府志》云：「至歐陽修一代大儒，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繼起者必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家誦詩書，人懷慷慨，文章節義，遂甲天下。」⁷⁶ 北宋人劉弇（1048-1102）曾談及宋代廬陵有以經術應科舉的傳統：「熙寧（1068-1077）中，天子黜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其時，廬陵應書幾三千人。」⁷⁷ 明永樂初年，胡廣（1369-1418）談到吉安府學聘經師彭誦（1375-1430）為訓導時說：「吉學之師，非深於經者不稱。」⁷⁸ 在吉安府安福縣，治《春秋》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宋代。安福縣最早的《春秋》學著作，大概是劉弇的《春秋講義》。⁷⁹ 宋代著名的《春秋》學者胡安國（1074-1138），對安福也有影響。同治《安福縣志》載：「王頤，幼警敏，胡安國過其父瀘溪草堂，語《春秋》，頤聽之，輒通大義。」⁸⁰ 王頤即王庭珪（1079-1171）之子。以生祭文天祥聞名的王炎午，為王庭珪族孫，業《春秋》，陞太學上舍生。⁸¹ 明代擅長《春秋》經的蒙岡王氏，就是王庭珪的後人。⁸² 元代安福學者亦有精於《春秋》者，如楊萬里的族孫楊鑑。歐陽玄〈楊鑑瑩之字說〉一文中說：「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齋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⁸³ 宋元時代的安福士人還著有不少《春秋》學著作，如尹四聰（1244 年進士）「家世經業」，而其孫尹

⁷⁵ 除下文述及的鮑琮之外，湖廣黃州府廣濟縣的董熙在任安福縣學教官時亦傳授《春秋》。董熙學《春秋》，入南京國子監，永樂二十一年（1423）鄉試第五名，「署諭安福，即以《春秋》傳授」。參見乾隆《黃州府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二〇，〈摭聞〉，頁 56。

⁷⁶ 余之禎纂修，萬曆《吉安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第 10 冊，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卷一一，〈風土志〉，頁 2。

⁷⁷ 劉弇，〈宋故歐陽文叟墓誌銘〉，高立人編，《廬陵古碑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43。

⁷⁸ 楊士奇，《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一六，〈彭士揚墓表〉，頁 226。

⁷⁹ 汪泰榮，《廬陵古文獻考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頁 465。

⁸⁰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人物〉，頁 8；卷一二，頁 2。

⁸¹ 李時勉，〈王炎午忠孝傳〉，郭景昌、賴良鳴編，《吉州人文紀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27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二五，頁 33。

⁸²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八，〈王處士墓誌銘〉，頁 266。

⁸³ 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0 冊），卷一三，頁 14。

用和續成《春秋通旨》，⁸⁴ 元人劉聞（1330 年進士）著《春秋通旨》，彭絲著《春秋辨疑》，劉瑾著《春秋說約》。⁸⁵ 元代安福縣有四位進士，其中劉聞、李廉皆以《春秋》學聞名，⁸⁶ 可見元末明初安福《春秋》學之發達。

李廉，字行簡，元至正二年（1342）進士，著《春秋會通》，薈萃諸家之說，「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所說及諸儒傳記，略加梳剔」。⁸⁷ 四庫館臣則稱其書「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⁸⁸ 明永樂間，朝廷修《五經大全》，多採此書。明初安福的《春

⁸⁴ 嘉靖《吉安府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31 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一三，頁 22。

⁸⁵ 劉瑾晚年肆力於《詩》，所著《詩傳通釋》為《五經大全》採入，見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人物〉，頁 8-9；卷一八，頁 107；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六，「詩傳通釋二十卷」條：「《大全》即用此書為藍本，故全用其說。」（頁 227）按，《詩經大全》以《詩傳通釋》為底本，參酌羅復《詩經集傳音釋》、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善《詩經解頤》三家解說。參見楊晉龍，〈《詩經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317-346。另據康熙《安福縣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孤本方志選編》〔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影印），卷三，〈人物·儒行〉，彭絲還撰有《禮記集說》四十九卷（頁 17-18）。其實，元明之際安福學者五經之學皆有成就。李時勉，《古廉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2 冊），卷八，〈跋周珏所藏先世手澤〉說：「安成儒者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者五人，齊齋、集齋、魯齋三彭先生，公瑾劉先生，行簡李先生也。三彭先生有《禮記圖纂》，劉先生有《詩傳通釋》，李先生有《春秋會通》行世。」（頁 7）黃宗義，《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七八，〈張祝諸儒學案〉稱，安福人彭復初亦「精於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頁 2624）然而，唯《春秋》經在明代科舉表現突出。對四十六科《會試錄》及六十二科《登科錄》的安福籍進士合併統計，得出進士及會試中式總人數為 166 人（兩種材料合併所得進士總人數，尚不及前文同治《安福縣志》六十二科的 197 人，乃因為地方志往往收錄已遷外地的安福學者），其中業《春秋》者 107 人，佔 64%，業《易》者 34 人，業《尚書》者 15 人，業《詩》者 7 人，業《禮記》者 2 人，本經不詳者 1 人。這表明，《禮記》與《詩經》在安福雖有傳統，但在明代的科舉中表現並不突出。

⁸⁶ 同治《安福縣志》卷八，〈選舉·科目〉，頁 44。按，劉聞以《春秋》中天曆二年己巳（1329）江西鄉試的第十二名；彭所存以《春秋》經中至正元年辛巳（1341）江西鄉試的第十二名。參見李治安，〈元代鄉試新探〉，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620, 622。

⁸⁷ 李廉，《春秋會通》（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62 冊），〈序〉，頁 164-165。

⁸⁸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春秋會通》二十四卷」條，頁 227。

秋》學者劉球對李廉該書評價甚高，以為「李公為《春秋會通》，而其教與江河同其流行」。⁸⁹ 與李廉同時擅長《春秋》經的安福學者，是李廉的朋友伍洪 (1328-1386)。伍洪，字伯宏，荷溪人，是明代安福縣第一位以《春秋》經中進士的學者。據稱李時勉 (1374-1450) 曾經受教於伍洪。傅維麟《明書列傳·伍洪傳》載：「見李忠文於童子時，奇之，動必教以正。逮別，送者數百，無不涕泣，神色怡然。進忠文等曰：『吾為家也，子異日當為國，勉之，勿自怠！』」⁹⁰ 雖然沒有資料證明李時勉曾向伍洪學習《春秋》，但是，李廉、伍洪和李時勉這三位《春秋》經進士之間的師友情緣，隱約勾勒了元末明初《春秋》經在安福縣授受的脈絡。

不過，在鮑琮到來前，安福的《春秋》經在科舉上的表現並不突出，尚不如福建閩縣、浙江淳安、臨海等地（參見表二）。鮑琮，字禮夫，咸寧人，「弱冠與同里方嵩受學於元解元胡可仕」，通《春秋》三傳，洪武庚午 (1390) 湖廣鄉試第八名，歷任台州、瑞州、吉安府學教授，晚年留居安福縣。⁹¹ 鮑琮定居安福，與安福人萬霽 (1386-1446) 有關。陳循〈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載：「君謂霽，季丙其字，號守中。……補鄉校弟子員。君既刻勵問學，連試於鄉不偶，既而以次當貢大學，乃曰：『仕不由科目，非吾志也。』力辭焉。聞前郡學教授鮑禮夫避患居青原，乃往迎致於家，講授《春秋》。未幾，禮夫被逮，連及其所為主。君曰：『古有以死蔽其友者，況於師乎？』卒脫禮夫於難。禮夫亦重安成之俗，遂卜家焉。安成俊秀因得資於禮夫，以《春秋》決科者甚眾，君之力也。」⁹² 鮑琮定居安福後，向安福士子傳授《春秋》經。同治《安福縣志》說：「相傳邑士子多習《春秋》，蓋鮑（琮）所傳云。」⁹³ 其門人劉球也說，鮑琮「以經學為遠近人所師法」。⁹⁴ 鮑琮的學生，除萬霽外，傑出者有吳節、劉球、李紹 (1407-1472)、王原等人。同治《安福縣志》載：「吳節，字與儉，號竹

⁸⁹ 劉球，《兩谿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3 冊），卷一九，〈跋李信豐手札後〉，頁 3。

⁹⁰ 傅維麟，《明書列傳》（收入《明人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 87-88 冊），卷一三六，〈伍洪傳〉，頁 241。

⁹¹ 清·陳樹楠、儲可權修，錢光奎、余益杞纂，光緒《續輯咸寧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27 冊，據清光緒八年刊本影印），卷六，〈人物·選舉列傳〉，頁 54。

⁹² 陳循，《芳洲先生文集》卷七，頁 41-42。

⁹³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三，〈人物·寓賢〉，頁 58-59。

⁹⁴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鮑時默南歸序〉，頁 12-13。

坡，西鄉雅源人，幼從鮑楚山學《春秋》，與同門劉球、王原、李紹輩並稱英俊。」⁹⁵ 彭華〈竹坡公行狀〉亦載：「（吳節）從鮑楚山學《春秋》。時忠愍劉公球、博士王公原、侍郎李公紹及楚山之子參議公時皆同門，一時號稱英俊。」吳節的舅父王景謨亦從學鮑琮之門。⁹⁶ 諸門人中，劉球於永樂十二年（1414）中舉；隨後，鮑琮之子鮑時與鮑琮門人王原、李紹、吳節等先後於永樂十八年、二十一年、宣德元年（1426）、四年中舉；劉球、鮑時、吳節、李紹四人又相繼於永樂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中進士。萬霽亦於宣德五年以《春秋》中進士。⁹⁷

宣德年間，鮑琮的安福門人在會試中成績突出：吳節是宣德元年江西鄉試的解元、宣德五年會試的經魁；李紹是宣德八年會試《春秋》經魁。吳節、李紹連續兩科摘得會試《春秋》經魁，其經義相繼刻入《會試錄》，安福學者在《春秋》經上的表現自然吸引了全國士子的目光。宣德五年會試同考試官蔣驥對吳節深習《左傳》特別欣賞，批曰：「治《春秋》者，當參考諸傳，以左氏為案，而斷以胡氏，不可偏廢也。學者往往欲速就簡，或置《左傳》不講，殊不思豈有舍案而能斷者哉？此題實本左氏，場中知者甚少，獨此卷能發揮其旨，言簡而當，理核而明。」據說，劉球亦「擅《春秋》三傳之學」。⁹⁸ 考官對李紹經義的評價，則集中於其作文之法及其得《春秋》褒貶之義：「有議論，有斷制，結語說出桓公心術，更勝他作」，「習舉業者，若專事對偶，未免重複冗長而有脈絡不貫之患；此卷齊整之中，又有開闔關鎖，褒貶較然明白。」⁹⁹ 可見，明初安福的《春秋》學仍保持了宋元以來的經學傳統，保持了對《春秋》經傳的通盤瞭解，尚未將《春秋》學庸俗化為科舉敲門磚。劉球、吳節、李紹的科舉成功，使他們成了治《春秋》經的士子的學習榜樣。據商輅（1414-1486）稱，李紹「善汲引後進，其及門受業以科第功名顯者甚眾」。¹⁰⁰ 吳節與劉球同在翰林院時，學者多師

⁹⁵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〇，〈人物〉，頁4。

⁹⁶ 吳節，《吳竹坡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冊，據清雍正三年吳琦刻本影印），〈附載〉，頁16-19；卷四，〈訥庵記〉，頁21。

⁹⁷ 同治《安福縣志》卷八，〈選舉〉，頁16, 45；《宣德五年進士登科錄》，頁30。

⁹⁸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66冊，據清刻本影印），卷一，〈壽姚君鵬程序〉，頁17。

⁹⁹ 《宣德五年會試錄》，頁25-26；《宣德八年會試錄》，頁11。

¹⁰⁰ 商輅，《商文毅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5冊，據萬曆三十年劉體元刻本影印），卷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李公墓誌銘〉，頁23。

之。彭華說：「（吳節）最善啟迪後學。初在翰林時，從遊者甚眾，口講指畫，日程而月試之，因其資質高下誘掖獎勵，以勸其進，故成材者多，若郝兵侍璜、鄒都憲來學、王都憲儉、盧都憲祥、李布政芳、干布政璠、齊憲副讓、林御史廷舉、陳僉憲志學、江太守浩、趙太守京及今殷戶書謙、李布政益，皆出門下，偉然有名望，殆未易以一二計。一時稱師道之盛者，未能或之先也。」¹⁰¹ 祁順（1460 年進士）就談到，東莞人盧祥（1402-1468）會試下第，「時翰林編修安成吳先生與儉以《春秋》之學名天下，公從之受業，功與日新」，後中正統七年（1442）進士。名氣小而未列舉的門人更多，如內江縣李臨安（1431-1473）、淳安縣洪宗瑩。李臨安字邦治，究心舉業，「從秋官王節用、大司成吳與儉二先生受《春秋》，得其旨，歸領景泰丙子（1456）鄉薦，登天順庚辰（1460）進士」；¹⁰² 洪宗瑩「幼入郡庠，明《春秋》經，得仲尼筆削微意，四舉於鄉弗偶，……循例陞南京國子監，執經問難於大司成安成吳公……於《春秋》益造其閫奧」。¹⁰³ 顯然，正統、景泰間李時勉、吳節先後出任國子監祭酒，對擴大安福《春秋》的影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鮑琮的另一位門人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劉球門人中最著名的是姚夔（1414-1473）。姚夔字大章，浙江桐廬縣人，「始以太學生從翰林侍講安福劉球先生受經」，¹⁰⁴ 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後官至吏部尚書。彭華〈冢宰姚公哀辭〉序稱：「公自正統初以《春秋》發解浙江第一，及壬戌（1442）會試又第一，廷對亦不下數人，由是名動四方。……公嘗游於吾鄉忠愍公。」¹⁰⁵ 姚夔對士人的影響很大，丘濬稱姚夔「以《春秋》三傳發解南省，俱為第一，而天下以經義遊藝場屋者，咸宗法之」。¹⁰⁶ 因此，姚夔曾從學於劉球的事實，多少擴大了安福《春秋》的影響。劉球門人中還有江西新建的林

¹⁰¹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七，〈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行狀〉，頁 561。

¹⁰²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7 冊，據清康熙二年在茲堂刻本影印），卷一三，〈都憲盧公傳〉，頁 18；卷一五，〈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李君邦治墓表〉，頁 8。

¹⁰³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 冊，據明弘治姚璽刻本影印），卷七，〈梅坡記〉，頁 19。

¹⁰⁴ 蕭鑑，《尚約文鈔》（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 冊，據清光緒三十一年蕭氏趣園刻本影印），卷六，〈送刑部姚君赴南京序〉，頁 11。

¹⁰⁵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七，頁 597。

¹⁰⁶ 丘濬，〈姚文敏公遺稿序〉，姚夔，《姚文敏公遺稿》，頁 463。

培之，與姚夔「同受業忠愍劉先生之門」。¹⁰⁷ 吉安府泰和縣曾鶴齡（1383-1441），亦遣其子曾蒙益「就侍講劉球先生受《春秋》，不踰時盡得其要領」。¹⁰⁸ 不過，相對吳節的廣收門徒，劉球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放射出安福《春秋》學的光彩。他的節義，讓安福的《春秋》學獲得了更高的聲譽。江西新淦縣的宋璉（1403-1436，1430 進士）曾從劉球學。劉球告訴他說，《春秋》的傳心要法乃在「推聖人筆削深意，端己而經世，伸道而遏邪」。¹⁰⁹ 正統八年（1443），劉球忤宦官王振下獄，為指揮馬順殺害於獄中，景泰間謚忠愍，忠直之名滿天下。在人們看來，劉球的忠節體現了《春秋》大義。劉定之（1409-1469）序《兩谿文集》云：「《春秋》明經世大法，凜凜嚴嚴，若水霜凝、泰華峙。……心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¹¹⁰ 因此，周敘在〈哀劉兩谿辭〉序中也說：「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先生後，紹而大之者，兩谿也。」¹¹¹

從正統四年到成化十七年（1481），每科會試的《春秋》經進士中，都有安福學子的身影，有時安福《春秋》經一科進士達到六人之多。在這十五科共計 382 名《春秋》經進士之中，安福有 39 人，所佔比率超過 10%（參見表三）。因此，至遲到十五世紀上半葉，安福《春秋》經的科舉優勢已經形成。

四·安福的《春秋》經與家族

明代安福《春秋》經的科舉優勢的形成與延續，與家族關係密切。世家傳承是安福縣《春秋》學經久不衰的關鍵。陳循在談及明初吉安府學術時說：「世代務習經史，父子、叔姪、兄弟、族姻自相為師友，十常二三。」¹¹² 這種家族內部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的情況，在安福《春秋》學的傳承中最常見。元明之際，安福縣不少家族即以《春秋》經傳家。李紹所在的浮山李氏即有《春秋》學的傳統，如李炬「於《春秋》、《左》、《國》尤暢厥旨，……以《春秋》授徒於家，遊

¹⁰⁷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六，〈贈林惟臣大尹之任鹽山序〉，頁 9。

¹⁰⁸ 蕭鑑，《尚約文鈔》卷一〇，〈曾蒙益墓誌銘〉，頁 33。

¹⁰⁹ 劉球，《兩谿文集》卷二三，〈工科給事中宋璉墓誌銘〉，頁 1。

¹¹⁰ 劉定之，《呆齋續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 冊，據明萬曆二十二年楊一桂補刻本影印），卷五，〈兩谿文集序〉，頁 1。

¹¹¹ 周敘，《石溪周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1 冊，據明萬曆二十三年周承超等刻本影印），卷七，〈哀劉兩谿辭（有序）〉，頁 84。

¹¹² 《明英宗實錄》（收入《明實錄》），卷二六八，「景泰七年秋七月丙申」條，頁 5690。

者多顯達。」¹¹³ 劉球所在的葛溪劉氏，其先世亦有習《春秋》經的傳統，「家世學《春秋》，以之掇巍躋臚，背項相望」。¹¹⁴ 在十五世紀初葉安福《春秋》在科舉上大放異彩之後，安福縣不少家族更以《春秋》為世業：荷溪伍氏在明初率先崛起，並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繼伍氏之後，葛溪劉氏、雅源吳氏、浮山李氏等家族在十五世紀前葉一時並起；十五世紀中葉，智溪彭氏與松田彭氏在科舉考試中成績突出，影響很大；十六世紀，澈源鄒氏成為安福縣以《春秋》經應考最成功的家族。

（一）荷溪伍氏

荷溪伍氏在安福北鄉，五代十國時自福建遷來，元至正丙申（1356）由安福縣城徙居荷溪，為安福鉅族，「世以貲雄鄉里」，¹¹⁵ 而且是明代安福縣最早以《春秋》經獲得科舉成功的家族。洪武四年（1371）以《春秋》經中進士的伍洪，是荷溪伍氏第十四世孫。伍洪之後，八世傳經，獲科名者甚多：(1) 伍洪子伍綸，字述經，未獲高級功名；(2) 伍洪孫伍冕，永樂二十一年（1423）舉人；(3) 伍冕子伍驥（1416-1465），字體馴，號德良，景泰五年（1454）進士；(4) 伍驥姪伍希淵，字孟賢，號拙庵，天順七年（1463）會試《春秋》經魁；伍驥子伍希閔，初名閻，以字行，改字仲孝，號順德，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伍希淵弟希齊，字孟倫，弘治三年（1490）進士；同輩中又有伍希儒、伍希周分別以《春秋》經中正德六年（1511）進士及正德九年會試中式；(5) 伍希淵子伍符，字朝信，號孚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伍希淵姪伍箕，正德六年進士；(6) 伍符姪伍全，字思謹，正德三年進士；伍令，字思竹，號魚山，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7) 伍箕孫伍惟忠（1537-1577），字效之，號盡吾，隆慶四年（1570）以《春秋》經鄉闈，萬曆五年（1577）進士。¹¹⁶ 從景泰五年到萬曆五年，荷溪伍氏前後五代有十一名進士，而僅僅在一四六四到一五一四年的短短五十年時間裏，荷溪

¹¹³ 康熙《安福縣志》卷四，〈人物·列傳〉，頁56-57。

¹¹⁴ 劉定之，《呆齋續稿》卷五，〈兩谿文集序〉，頁1。

¹¹⁵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三，〈送伍進士知隨州序〉，頁242。

¹¹⁶ 《景泰五年進士登科錄》，頁78；《天順八年進士登科錄》，頁20；《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頁13；《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頁49；《弘治三年進士登科錄》，頁67；《正德三年進士登科錄》（明正德三年刊本），頁24；《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頁32, 48；《正德九年會試錄》，頁25；《嘉靖丙辰（1556）同年世講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13冊），頁6626；《萬曆五年進士登科錄》，頁23。

伍氏就有八名進士。弘治朝，伍符與父希齊、伯父希淵三人曾同時以進士入仕，門第極盛。費宏（1468-1535）〈送進士伍君孟倫歸省詩序〉云：「伍，世家也，代有顯人，今大參公（指伍希淵）以《春秋》魁兩試，由郎中出典州郡，擢佐方嶽。宦愈久，望愈彰，位將愈崇，而父之母弟孟倫（即伍希齊）、子朝信（即伍符）偕領癸卯（1483）鄉薦，朝信登丁未（1487）進士第，……今年，孟倫復登進士第，由是昆弟父子顯於一時，其功名富貴皆與三槐桐木頡頏上下，以播稱於談者之口。雖安成多賢才，任官者項背相望，然求如伍氏之盛，亦不多見！」¹¹⁷而且，除伍洪之子伍綸、孫伍驥的本經不清楚外，其餘獲得進士功名的伍氏子孫皆以《春秋》為本經。明人崔銑（1478-1541）說：「安成伍氏八世傳《春秋》」，¹¹⁸而過庭訓（1604年進士）讚其「一門累葉，以《春秋》擅名於時」。¹¹⁹其實，伍氏進士遠不止以上列舉的十一人，舉人則更多。萬曆間，劉元卿說：「伍氏世家荷溪，為邑著族，成進士十三人，里選幾三十人。」¹²⁰沿至明末清初，荷溪伍氏在科舉上仍有表現，如伍承載，字象坤，號華武，北鄉荷溪人，中天啟壬戌（1622）進士。¹²¹伍承載與麻城田生金（1604年進士）、常熟錢謙益（1582-1664）等人一同列名於《新刻春秋談虎講意》的〈麟經參閱諸名家姓氏〉之中，¹²²是晚明的《春秋》經名家。

（二）葛溪劉氏

葛溪劉氏自劉球的祖父劉子定從茨溪遷入。劉球嘗仿浦江鄭氏，「合門千有

¹¹⁷ 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15冊，據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影印），卷一〇，頁862。

¹¹⁸ 崔銑，《洹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卷二，〈經施〉，頁21。

¹¹⁹ 過庭訓，《本朝京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60-63冊，據明末刻本影印），卷六六，〈伍驥〉，頁9。

¹²⁰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八，〈進士盡吾先生行狀〉，頁21。舉人中知名者如伍思韶（1500-1588），字舜成，號九亭，晚號鴻磐叟，嘉靖七年（1528）舉人，官至廣安知州。又，伍全之子伍宇，字參之，號兩江，以《春秋》中明嘉靖辛卯（1531）舉人，官至柳州府同知。參見：王時槐，《友慶堂存稿》（明萬曆三十八年蕭近高刻本，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資料室藏），卷五，〈廣安知州九亭伍公墓誌銘〉，頁12-15；劉昔章、姚義興主編，《瀟瀟人家》（安福：政協安福縣委員會、安福縣志編纂委員會，2005），頁576。

¹²¹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〇，〈人物·宦績〉，頁61。

¹²² 周希令、方尚恂、徐有成，《新刻春秋談虎講意》（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第4-5冊，據明天啟甲子刻本影印），卷首，頁26。

餘指，旦暮共食」，¹²³ 可見其家族規模很大。劉氏以《春秋》取科第，則自劉球始。劉球為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其從弟劉玘，字求素，號雙林，「初從忠愍受《春秋》，博聞強記，文章暢達，補邑庠生，領鄉薦，登正統己未（1439）進士」。¹²⁴ 劉球兄弟以後，子孫多以《春秋》取科第：（1）劉球長子劉鉞，字仗德，正統丙辰（1436）進士；次子劉鈺，字仗和，景泰五年（1454）進士；劉球之弟劉理的次子劉鑑，字仗時，成化二年（1466）進士；（2）劉鈺之子劉縝，成化二十年會試第九名；劉紘，字景瞻，劉球孫，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3）劉球姪劉鈞的兩個孫子——劉祥與劉提——分別為弘治九年、正德六年（1511）進士。¹²⁵ 從一四二一到一五一一年的九十年間，葛溪劉氏四代內產生了九位進士，故張萱（1582 年舉人）《西園聞見錄》稱：「（劉氏）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¹²⁶

（三）智溪彭氏與松田彭氏

彭氏是安福以《春秋》經取科第最成功的家族之一，其最盛的階段是十五世紀中期彭時（1416-1475）、彭華（1432-1496）兄弟先後科場高捷時。彭時為松田彭氏，彭華為智溪彭氏，然同出於梅下彭氏，彼此淵源頗深。梅下彭氏至第十五世彭伯清（名根，1319-1383）、彭復安兄弟始分松田、智溪兩派。伯清生子務威；復安生子同升。同升、務威兩位從兄弟來往密切。李時勉〈彭隱士同升墓誌銘〉載：「先兄恒心先生有友四人，其一蒼山彭君同升先生。……（同升）與從兄務威相與尤盡道，所居離隔若干里，歲時必相過談論，款留累日，極歡而後別。」¹²⁷ 彭同升是否精通《春秋》經尚不清楚。但是，李時勉的兄長李恒心非但

¹²³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6 冊，據清康熙五年彭志楨刻本影印），卷七，〈劉益軒傳〉，頁 7。

¹²⁴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四，〈雙峰劉公傳〉，頁 4。

¹²⁵ 《正統元年會試錄》，頁 3；《景泰五年進士登科錄》，頁 13；《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 36；《成化二十年會試錄》，頁 14；《弘治十八年進士登科錄》，頁 38；《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頁 50。按，《弘治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內所載劉紘的父祖姓名不詳，「曾祖伯文」即劉球之父。又，道光《江陰縣志》（清道光二十年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一五，〈名宦〉載：「劉鑑（紘），字景瞻，江西安福人，忠愍公球四世孫，治《春秋》有名，宏（弘）治乙丑進士。」（頁 11）四世孫的說法有誤，劉紘當為劉球孫。

¹²⁶ 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明人傳記叢刊》第 116-124 冊），卷一，頁 92。

¹²⁷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九，〈容膝先生墓表〉，頁 11；卷一〇，〈彭隱士同升墓誌銘〉，頁 40。

曾引導李時勉治《春秋》經，還是劉球的啟蒙老師，¹²⁸ 可能對《春秋》經有一定的研究。因此，作為李恒心的朋友，彭同升對《春秋》經有一定接觸也是可能的。就像元末李廉、伍洪等人的交遊一樣，安福縣研習《春秋》經的儒士圈可能在明初同樣存在。不過，直到彭同升第四子彭貫（1408-1460）中進士，彭氏《春秋》才開始嶄露頭角。彭貫字進唯，號一齋，正統元年（1436）以《春秋》經中會試第五十二名。此後，彭貫子彭彥充（1430-?）、彭華、彭禮（1443-?）皆以《春秋》經中進士。彭彥充字仲英，天順元年（1457）會試第四名；彭華字彥實，號素庵，景泰五年（1454）會試第一名；彭禮字彥恭，成化八年（1472）會試第四十一名。另外，彭貫之姪彭善（1429-?），字顏積，以《春秋》經中成化二年進士。¹²⁹ 松田彭氏的聲譽，則自務威之子彭琉（1391-1458）起。彭琉字毓敬，號慎庵，永樂十六年（1418）進士。李賢〈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慎庵彭公墓表〉說：「公（彭琉）行三，自幼卓秀，受業於古廉（李時勉）、退山先生，蚤有時譽。」¹³⁰ 既然受業於《春秋》名家李時勉，而且又是彭時的老師，彭琉多半是以《春秋》為本經。彭時字純道，正統十三年狀元。成化年間，彭時、彭彥充、彭華、彭禮、彭善兄弟五人同朝為官。成化十一年，彭貫長子彭禔「忽念其三弟，思一相慰藉」，自江西北上，「先過南京從弟大理寺正（彭）善所，盤桓數日別」，「既抵京師，傾倒五越月，乃從從兄太師文憲公（即彭時）之喪南歸」。彭禔的探親歷程，頗能反映了彭氏兄弟一時出仕之盛況。因此，浙江桐廬縣的《春秋》名家姚夔也命其子姚璧從彭華習《春秋》。¹³¹ 彭時卒於成化十一年，十年後彭華再入閣，彭氏榮光依舊。成化二十三年彭華致仕後，彭氏《春秋》經不復往昔之盛，但仍有藉《春秋》學取科第者。弘治九年（1496），彭彥充

¹²⁸ 吳節序《謚忠文古廉文集》云：「先生生洪武甲寅（1374），早孤，以兄誨游泮庠，飭經學。」載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二》，頁369；陳循，《芳洲文集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8冊，據明萬曆四十六年陳以躍刻本影印），卷四，〈劉求錫墓誌銘〉：「求錫諱珪……贈禮部主事諱純之季子，贈翰林學士諱球之弟……自幼疑敏，稍長知學，初從諸父清樂、梅坡與兄球從李僉事伯真及李恒心、陳孟楫學，習舉子業。」（頁19-20）

¹²⁹ 《正統元年會試錄》，頁3；《天順元年進士登科錄》，頁470；《景泰五年進士登科錄》，頁13；《成化八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3冊），頁1160；《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16。

¹³⁰ 焦竑，《獻徵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卷八八，頁79。

¹³¹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五，〈亡兄彭參洪墓誌銘〉，頁40；卷四，〈跋大宗伯姚公大章書札後〉，頁18。

之孫彭夔 (1474-?)，字師舜，會試第七十二名。¹³² 儘管彭夔時已移籍袁州府宜春縣，不過，在外人看來，彭夔受惠於安福彭氏的遺澤。毛紀 (1463-1545) 在贈彭夔赴任福建按察使的序文中就不忘提及彭夔的祖籍，說：「安成江右之望也，而彭氏又安成之望也。」¹³³ 萬曆三十五年 (1607)，彭華五代孫彭篤福以《春秋》經中進士。¹³⁴ 從一四一八年彭琉中進士起到一六〇七年彭篤福中進士，七代之內，有九人獲得進士功名。

(四) 澈源鄒氏

澈源鄒氏以鄒守益理學聞名。然而，鄒氏家族的科舉成功，則多賴《春秋》經之力。宋儀望〈鄒東廓先生行狀〉載：「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述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諱思傑，俱隱德弗仕。」¹³⁵ 儘管澈源鄒氏自克修始即以儒傳家，但未獲得高級功名。澈源鄒氏的發達是從鄒守益的父親鄒賢於弘治九年中進士開始的。鄒賢之弟鄒貴 (1465-?)，科舉不第，然以《春秋》聞名鄉邦，彭夔即其門人。¹³⁶ 鄒守益十七歲中舉，「少間乃受徒講《春秋》」，¹³⁷ 至正德六年 (1511) 以《春秋》經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三名。¹³⁸ 其子孫後多以《春秋》掇科第：長子鄒義，嘉靖二十二年 (1543) 舉人；次子鄒美，嘉靖四十年順天舉人；三子鄒善，字繼甫，號穎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孫鄒德涵 (1538-1581) 字汝海，號聚所，隆慶六年 (1572) 進士；鄒德溥字汝光，號泗山，萬曆十一年 (1583) 進士；鄒德泳 (1556-1633) 字汝聖，號瀘水，萬曆十四年進士；鄒德淇 (1601-1650) 字汝成，號次竹，業《春秋》，崇禎十三年 (1640) 進士。¹³⁹ 從十五世紀末鄒賢中進士，至明末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內，鄒

¹³² 《弘治九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4冊），頁30。

¹³³ 毛紀，《鼇峰類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5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七，〈贈少參彭君師舜之任閩藩序〉，頁7。

¹³⁴ 《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登科錄》（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頁12。《登科錄》記載彭篤福曾祖名彭師丙，嘗蔭中書舍人。師丙，彭華之孫，正德七年蔭中書舍人。參見《明武宗實錄》（收入《明實錄》），卷八五，「正德七年三月戊午」條，頁1832。

¹³⁵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一一，〈鄒東廓先生行狀〉，頁18。

¹³⁶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二，〈艮山叔父壽言〉，頁22-23。

¹³⁷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一一，〈鄒東廓先生行狀〉，頁18-19。

¹³⁸ 《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頁1。

¹³⁹ 同治《安福縣志》卷八，〈選舉·科目〉，頁23；卷一一，〈人物·儒林〉，頁24。

氏四代進士七人，所謂「一門四世，甲第蟬聯」。¹⁴⁰ 直至晚明，著名學者焦竑（1540-1620）尚說：「今天下《春秋》耑門，必推安成鄒氏。」¹⁴¹

在前述四十六科會試 82 名安福《春秋》經中式者之中，有 29 人出自以上四個家族，佔 35%，可以想見這些家族在明代安福縣科舉方面的影響力。此外，安福縣肄習《春秋》經的家族還有一些。李紹、吳節、萬霽的後人們，都延續了父輩在《春秋》上的成功：李瑑與萬繡（1431-1496）以《春秋》中成化二年（1466）進士；吳遠以《春秋》中天順元年（1457）進士。另外，浮山劉氏自劉秩（1457 年進士）起，其子劉孟（1487 年進士）、姪劉藍（1505 年進士）、從孫劉汝輓（1523 年進士）皆以《春秋》為本經。前溪劉氏的劉彝（1451 年進士）、劉倫正（1454 年進士）、劉遜（1478 年進士），嘉溪王氏的王理（1442 年進士）及曾孫王一夔（1547 年進士）等亦皆以《春秋》為本經。¹⁴² 在這些家族科舉成功的背後，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數世怙守一經。實際上，正是數代人對於《春秋》經的堅守，才換來安福《春秋》經在科舉上持續的優勢。安福的家族在這一過程中，其一是像許多世家大族一樣，家族中的科舉成功人士承擔起了教育後輩以保證家學傳承的責任，為後生子弟提供優越的讀書環境。例如，吳節致仕家居時，「立祠以奉先，藏書以訓子姪」。¹⁴³ 伍符晚年，「盡斂其所藏之書，自四書五經以及諸子歷代之史，庋於先祠之樓，使宗族鄉閭之子弟咸讀其中」。¹⁴⁴ 應該說，這是從物質環境上給予家族子弟的保障。其次，在這些家族中，父子、兄弟、叔姪之間的授經，最為常見。例如，伍希淵從叔父伍驥習《春秋》，彭時從叔父彭琉、彭

《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登科錄》，頁 19；《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錄》，頁 27；《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錄》，頁 14；《萬曆丙戌科（1586）進士同年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20 冊），頁 60；《文莊公第六子派下世次》（民國刊本）。

¹⁴⁰ 桂繼良，〈鄒公昭昂氏七十壽序〉，《安成鄒氏重修支譜》（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頁 1。

¹⁴¹ 焦竑，〈易會序〉，鄒德溥，《易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3-14 冊，據清同治九年袁州府學副齋活字本影印）。

¹⁴² 《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 21, 29；《天順元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2 冊），頁 498；《景泰二年進士登科錄》，頁 35；《景泰五年進士登科錄》，頁 34；《成化十四年進士登科錄》，頁 74；《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 21。張藝曦考證前溪劉氏有進士九人，參見氏著，《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頁 198。九人中，劉模（1523 年進士）以《易》為本經，見《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 59。

¹⁴³ 康熙《安福縣志》卷三，〈人物·名臣〉，頁 56。

¹⁴⁴ 鄒守益著，董平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六，〈伍氏先祠藏書記〉，頁 318。

貫等人習《春秋》，伍惟忠從學於族叔伍思韶而「得其傳」。¹⁴⁵ 這種基於血緣關係的授受，在安福縣《春秋》經的傳授中屢見不鮮，而且由於世代相傳，遂形成一種家學。

明人亦多以「家學」來指稱此種數世怙守一經的家族教育。張時徹（1523 年進士）稱，伍符幼時，祖父伍麟「教之《春秋》，以世家學」。¹⁴⁶ 鄒守益稱葛溪劉氏的劉洙（1486-1538）「師其叔父寧鄉尹，嶄然續家學」。¹⁴⁷ 王時槐（1522-1605）等人編纂的萬曆《吉安府志》在鄒守益傳中這樣寫道：「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¹⁴⁸「家學」在這裏既有數世相承的形式上的特點，也有其具體的內涵。治《春秋》經的科舉世家，一般會有家傳的經說，為子孫相承以取科第。前述伍氏子弟珍藏的先輩《春秋》經義即是一例。劉定之亦稱葛溪劉氏有「其家經說」。¹⁴⁹ 清代安福人康五瑞（1697 年進士）形容明清時代的家傳經說時說：「家私一冊，父傳其子，兄傳其弟，以試場屋科名，往往取之。」¹⁵⁰ 對於明代肄習人少的孤經《春秋》來說更是如此。明人姜寶（1553 年進士）說：「今舉子業《春秋》者，往往難其傳。專門名家之淵藪，海內悉數之不多有也，……多秘密以相習而私相授受，即有叩請，靳弗傳。專門名家外有可以傳，即欲舉而傳諸人，人弗信，亦弗傳也。」¹⁵¹ 錢謙益甚至將鄒守益家族數世

¹⁴⁵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八，〈奉直大夫廣安州知州九亭全公行狀〉，頁 171。

¹⁴⁶ 張時徹，《芝園定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2 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四二，〈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孚齋伍公墓誌銘〉，頁 1。

¹⁴⁷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三，〈大學生劉持貞墓誌銘〉，頁 1067-1068。

¹⁴⁸ 萬曆《吉安府志》卷二四，〈理學傳〉，頁 6。對於在陽明學和《春秋》經上都有重要地位的澈源鄒氏而言，兩者都是家學。康熙《安福縣志》在鄒守益的傳中說：「子義、美、善、養、蓋，孫德涵、德溥、德泳、德灌克以學世守其家；……德涵登進士，即上疏乞以大儒王守仁從祀孔廟，下禮部議，即此可見其家學矣。」前者列舉諸子諸孫，則家學似言其《春秋》經之傳承；後者言德涵疏請王守仁從祀，則專指陽明學為家學。又，黃宗羲，《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一六，〈江右王門〉稱鄒德涵「以悟為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而鄒德泳「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頁 382-383），則所稱「家學」非但指陽明學，還強調鄒守益在陽明後學中的派性。

¹⁴⁹ 劉定之，《呆齋存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 冊，據明萬曆二十二年楊一桂補刻本影印），卷一〇，頁 6。

¹⁵⁰ 康五瑞，〈春秋纂要序〉，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七，頁 42。

¹⁵¹ 姜寶，《姜鳳阿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7-128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一七，〈家居稿·刻春秋心問小序〉，頁 4。

相傳的經說比之為漢代的師說：「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其祖父，至今百餘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有以過也。」¹⁵² 晚明一些科舉世家的經義出版物，甚至在書名中標以「某氏」、「世業」的字樣，如麻城人耿定向（1524-1597）子耿汝愚的《耿氏春秋》、耿定力（1571年進士）子耿汝恣（1615年舉人）之《麟經古亭世業》，¹⁵³ 而耿汝思在為耿汝恣《春秋愍渡》一書所作序中自信地說，此書出後，將「布之□塾，習之生徒」，而「為耿氏學者將遍天下」，¹⁵⁴ 體現了對「家學」相當的自信。

為了延續家學，更為藉此持續獲得科舉成功，安福不少家族還著力營造合族共習一經之風。劉定之在為劉玘所撰的〈招魂辭〉中描述了葛溪劉氏在十五世紀中葉學習《春秋》經的風氣：「始君（劉玘）之業儒，闔族相與講明《春秋》。其兄翰林學士忠愍公求樂，君所師；忠愍子建寧郡守仗德、監察御史仗和既師其父，又旁請□於君。君與之相繼用是經科巍仕臚，文聲政譽，各售所長於世。」¹⁵⁵ 姚夔為劉鈞（?-1454）所作〈墓誌銘〉中也談到葛溪劉氏一門肄習《春秋》經的風氣：「君姓劉，諱鈞，字仗智，重齋其別號也。……前刑部員外郎雙溪先生（劉玘）得《春秋》旨要於其兄忠愍公，為學者所宗。遂遣就學。逾年，學大進，為文章新奇可愛，間以業質於堂兄今建寧守仗德（劉鉞）及內兄今雲南參政路君斐資（路璧），磨礱浸溉而學益進。竹莊喜其有成，乃遣入邑庠，與明師良友游。……嘗即泰和寺廢址構庵，邀堂弟今浙江提學副使仗和（劉鈺）講學其中，折節相與討論。其內弟今南京刑部員外郎路斐章（路璋）來從遊，君館穀而啟迪焉。」¹⁵⁶ 從姚夔的記述可見，劉鈞非但從叔父劉玘學，而且還向堂兄劉鉞、內兄路璧請益，又構居舍於廢地，與堂弟劉鈺、內弟路璋共學，交流的對象非但有同族的兄弟，還有姻親在內。共習一經之風再往前發展一步，還出現了以科舉為目的的家會。晚明，荷溪伍氏的伍惟忠「率家之子姓月作德業、舉業兩會。……舉業則親甲乙其文」。¹⁵⁷ 在澈源鄒氏，鄒守益的後人為延續其家族在

¹⁵²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二九，〈春秋匡解序〉，頁876。

¹⁵³ 《麻城耿氏族譜》（清同治五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二〇，〈列傳〉，頁28、30。

¹⁵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頁336。

¹⁵⁵ 劉定之，《呆齋存稿》卷一〇，〈秋官劉君招魂辭〉，頁6。

¹⁵⁶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重齋劉君墓誌銘〉，頁13。

¹⁵⁷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八，〈進士盡吾先生行狀〉，頁21-23。

《春秋》經上的輝煌，更倡行「家會」，宣稱「家學淵澄，未應斬於五世，父書明備，猶可守其一經」，「爰締會於宗祠，共勉繩茲祖武，大扶文運，兼振門風」。¹⁵⁸ 因此，相對私密的經說、基於血緣的毫無保留的授受關係、科舉成功的先輩為後輩提供的物質保障，以及家族內共同肄習一經的風氣，使家學承繼在安福《春秋》的傳承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也成為安福縣專經《春秋》的主線。

五・婚姻、師承與交流圈的擴大

家學傳承支撐了安福縣的地域專經。但是，以《春秋》為本經的眾多家族的存在，卻並不是安福《春秋》經科舉成功的全部，更不意味封閉與壟斷。在安福數百年肄習《春秋》經的歷史中，擅長《春秋》經的家族之間，有密切的往來，包括婚姻與師承傳授。就某種意義言，婚姻和師承是血緣關係的放大，前者因女性的加入而使得血緣關係向異姓延伸，後者則構築了一種擬血緣化的關係。¹⁵⁹ 如果說家學傳承是安福《春秋》經肄習長盛不衰的基礎，那麼，以《春秋》為本經的科舉世家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扶持，則是安福《春秋》經科舉優勢得以長期保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一方面，即便出身傳統的《春秋》經科舉世家，向其他家族的學者學習也是必要的。例如，劉球之子劉鉞和劉鈺，曾分別從彭貫、李紹問學；伍希閔亦曾以彭華為師。伍符除了從祖父伍麟學習外，還從學於劉球之孫劉鎮，而劉鎮之子劉祿反過來又向伍符及趙璜（1490 年進士）問學；澈源鄒賢從學於劉鎮，而劉球之孫劉紘、曾孫劉提又以鄒賢為師，劉提之子劉弘教、劉弘政復以鄒賢之子鄒守益為師；彭彥充的孫子彭夔，曾從學於鄒守益的叔父鄒貴。¹⁶⁰ 另一方面，安福的《春秋》名家如李時勉、劉球、彭華、劉鎮、鄒賢、鄒守益等人，往往是安福縣士人共同的經師。他們不但不排斥外族子弟前來學習，而且，他們的經學教育可能還會促成新的《春秋》經家族的興起。劉定之稱，自兩谿劉氏擅《春秋》經後，「近邑遠郡諸俊彥得其家經說以出仕者尤多」。¹⁶¹ 林瀚為彭華所作〈行狀〉說：

¹⁵⁸ 《澈源鄒氏七修族譜》（清乾隆五年刻本），〈家會文〉，頁 87。

¹⁵⁹ 參見劉曉東，〈明代私塾中的「師徒」關係芻議〉，《東北師大學報》2012.6：69-74。

¹⁶⁰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三，〈大學生劉持貞墓誌銘〉，頁 1067-1068；卷五，〈周氏孺人七十壽序〉，頁 291-292；卷二，〈艮山叔父壽言〉，頁 22-23。

¹⁶¹ 劉定之，《呆齋存稿》卷一〇，頁 6。

「子姓姻鄰遠及四方之士受業者日眾，承指劃者多以科名顯」。¹⁶² 通過向科舉世家《春秋》經師學習而獲功名，並且從此以《春秋》經傳家的情形也不少。例如，梅溪張洪（1411-1449）從吳節受《春秋》之旨，¹⁶³ 中進士，而梅溪張氏自此成了安福縣《春秋》經科舉世家之一。澈源鄒氏本無《春秋》的傳統，但鄒賢從劉績學《春秋》，登科第，成為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安福《春秋》學的代表人物，而鄒氏也成為安福縣以《春秋》經取科第最成功的家族之一。

婚姻在安福《春秋》學的傳承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門第相當，在著名的《春秋》經世家之間，彼此通婚是很經常的事情。例如，智溪彭同升的長女嫁給了伍洪之孫伍冕。¹⁶⁴ 所以，伍冕是彭華的姑父，伍冕之孫伍希閔師從彭華，則有婚姻和表親的背景。葛溪劉鈞的長女嫁給了伍希淵。¹⁶⁵ 梅溪張敷華之子張儒卿娶劉鈞之孫女，而張儒卿之長女又嫁給了浮山李氏的李恒。¹⁶⁶ 鄒守益妻王氏係王理之孫女，後來王理的曾孫王一夔則從學於鄒守益。可見，在彭氏、劉氏、伍氏、鄒氏等《春秋》學家族之間，有通過婚姻、師承而結成的密切網絡。更為重要的是，婚姻關係使《春秋》經的傳承向姻族延伸，使越來越多的家族加入《春秋》經肄習的圈子。例如，下泖阮氏、八都路氏，都是因為與葛溪劉氏的姻親關係而成為擅長《春秋》學的家族。阮玘（1436-1474），字廷用，安福下泖人。其父阮光昱「娶劉忠愍女」。因此，阮玘是劉球的外孫。阮玘「幼學於舅氏仗德藩參（劉鉞）、仗和憲使（劉鈞）暨從舅仗時縣令（劉鑑），業《春秋》甚習，以天順壬午（1462）發解江西，明季中會試，又明季登進士第」。¹⁶⁷ 阮氏此後還產生了一位進士（阮薇）和兩位舉人（阮芳、阮范），¹⁶⁸ 且阮芳、阮范分別是弘治五年（1492）、嘉靖四年（1525）江西鄉試的《春秋》經魁，有不錯的成績。¹⁶⁹ 八都路氏更為典型。路氏科舉上的成功，始於路璧、路璋兄弟。路璧（1412-?），字

¹⁶² 林瀚，〈少傳謚文思彭先生行實〉，彭華，《彭文思公文集·附錄》，頁750。

¹⁶³ 彭時，《彭文憲公集》（清乾隆間彭坊重刻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卷七，〈故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頁42-44。

¹⁶⁴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〇，〈彭隱士同升墓誌銘〉，頁40。

¹⁶⁵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重齋劉君墓誌銘〉，頁13。

¹⁶⁶ 劉秉常，〈張母劉孺人墓誌銘〉，高立人，《廬陵古碑錄》，頁288。

¹⁶⁷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卷五，〈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阮君墓誌銘〉，頁39。

¹⁶⁸ 劉昔章、姚義興，《瀟瀟人家》，頁811。所稱明代進士阮薇，可能有誤。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及安福縣地方志皆不載。

¹⁶⁹ 《弘治五年壬子科江西鄉試錄》，頁23；《嘉靖四年乙酉科江西鄉試錄》，頁24。

斐資，號重器，西鄉八都人，正統壬戌（1442）進士。路璋是路璧之弟，字斐章，天順元年（1457）進士。二人皆以《春秋》為本經。¹⁷⁰ 從《登科錄》看，路璧的先輩並未獲得任何高級功名。兄弟二人的崛起，完全是受到其婚姻之家葛溪劉氏的影響。路璧之妹、路璋之姊嫁給了劉球的姪子劉鈞，劉鈞因此與劉球之子劉鈺、內弟路璋一時同學，而路璋也與劉鈺同登科第，¹⁷¹ 而路氏的科舉成功亦自此延續。路璧之姪路麟，字肇治，以《春秋》中弘治三年進士。¹⁷² 另外，八都路氏在明代還有舉人三名，即成化七年（1471）的路魁、成化十六年的路順以及嘉靖元年的路子泰，而路子泰的本經可以確定為《春秋》。¹⁷³ 可見，師承與婚姻，對安福《春秋》經肄習圈的擴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春秋》經的學習與交流在安福縣境內是開放的。《春秋》經科舉世家之間雖然互相支撐，但不存在壟斷。劉孔當從學於伍氏遭拒後改從鄒德溥習《春秋》，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安福的《春秋》經肄習，從一開始就不局限於一家一族，而常擴及「姻鄰」乃至「四方之士」。鄒守益〈壽姚君鵬程序〉云：「茨谿劉忠愍公擅《春秋》三傳之學，其後栗庵先生懋弘祖訓，以淑多士。於時家君易齋大夫及劉郡守持慶、伍少方伯朝信（伍符）、姚君鵬咸卒業焉。嗣是先後登仕籍，隱隱有聲。」¹⁷⁴ 顯然，劉鎮門下有不少外姓子弟。劉元卿回憶荷溪伍惟忠「率家之子姓月作德業、舉業兩會」，劉元卿「攜弟執經師門」，伍惟忠視劉元卿同「家人父子」。¹⁷⁵ 這是外族子弟在《春秋》學家族受優待之一例。大量不甚知名的《春秋》學者的存在，也使得少數家族對《春秋》學的壟斷不太可能。同治《安福縣志》記載了周泰、劉滂等一些並未獲高級功名的經師：「周泰，號景哲，南鄉龍田人，博學善詩文，尤精《易》、《春秋》，隱居訓徒，得其兩經傳授者多顯達，……後以子啟貴贈大理寺評事」；「劉滂，字擴浩，西鄉龍雲下村人，貢生，博覽群書，尤深於《春秋》，邑中治《春秋》者皆師之，嘗遊粵東惠州。」¹⁷⁶ 周泰和劉滂都不是出身於《春秋》經的科舉世家。但是，此類

¹⁷⁰ 《正統七年進士登科錄》，頁 29；《天順元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2 冊），頁 475。

¹⁷¹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重齋劉君墓誌銘〉，頁 13。

¹⁷² 《弘治三年進士登科錄》，頁 56。

¹⁷³ 劉昔章、姚義興，《瀘瀟人家》，頁 832；《嘉靖元年壬午科江西鄉試錄》，頁 17。

¹⁷⁴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頁 17。

¹⁷⁵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八，〈進士盡吾先生行狀〉，頁 21-23。

¹⁷⁶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人物·文學〉，頁 32-33。

經師的存在卻構成了安福縣《春秋》學厚重的群眾基礎，也使得《春秋》經的肄習不會只局限於個別家族。而且，某些原本毫無家學淵源的學者因為天資出眾，成為著名的《春秋》學者，像澈源鄒氏的鄒賢。鄒守益說：「昔我易齋大夫（鄒賢）傳忠愍公《春秋》之派，以淑諸生。凡經指授者，循循有矩矱，出而登科第，有聲朝著郡邑間。若郡守劉子天澤、劉子本用、運使歐陽子恂、正郎劉子時望、黃門劉子紘、劉子提、邑尹周子鯉、吳子山、僉憲王子朝臣、廷評李子喬、掌教陳子季麟、歐陽子瑚、少宰王子學夔、柱史張子鰲山，皆一時之選。」¹⁷⁷ 像葛溪的劉紘、劉提，梅溪的張鰲山這些《春秋》學世家的子弟們，至是反從鄒賢問學。功名止於諸生的王仰（1495-1533），也是十六世紀安福縣著名的《春秋》經師。鄒守益〈王孔橋墓志銘〉載：「仰字孔橋，……以《春秋》起家邑庠。鄉之世家爭延為弟子師。」王仰《春秋》經上的造詣，從他後來在南京國子監時受邀為湛甘泉編撰《春秋格物通》可知，而鄒守益任廣德州判官及南京禮部郎中時，亦迎王仰至，以教其諸子。¹⁷⁸ 顯然，通過個人努力，王仰獲得了安福《春秋》經科舉世家的尊重。可見，一方面安福縣的《春秋》經肄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包括幾個大家族在內的交流圈，但另一方面這個交流圈在不斷地擴大，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一旦出現了在《春秋》經上有高深造詣的學者，科舉世家的子弟不會自矜身分，而能虛心請益，擇善而從，決不故步自封。這是安福《春秋》成功的一個關鍵。個別家族在《春秋》經上的表現會有盛衰，但深厚的社會基礎則使得安福的《春秋》在科舉上的優異表現延續得更久。

從全國範圍看，人口流動、外地學者的來學、經義著述的出版，也使安福的《春秋》經說在全國範圍內流動。人口的流動，包括宦遊、遊學、教塾和移民，都推動安福《春秋》學向外流播。劉球、吳節任職翰林院、國子監時，接納了很多外地門人。鄒義「春闈不遇，入大學肄業，講麟經，名震京師」。¹⁷⁹ 鄒德涵「己未（1559）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海內譽髦士多從之結社，脩博士業」，時麻城耿定力亦在社中。¹⁸⁰ 安福業《春秋》經者往各地教館尤多。聶豹說：「今天

¹⁷⁷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二，〈明故知巴東縣事默庵周君合葬墓志銘〉，頁1040。

¹⁷⁸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三，〈王孔橋墓志銘〉，頁1058；周怡，《周訥谿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周氏燕翼堂刻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文錄卷二，〈送安成王君孔喬歸省序〉，頁34。

¹⁷⁹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人物·儒林〉，頁24。

¹⁸⁰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1冊，據明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影印），卷一二，〈明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誌銘〉，頁11。

下習舉子業專經《春秋》者，咸宗安成，……故安成之士凡專經有望者，四方常聘無虛歲。」聶豹記載的王石泉「以望應聘至永豐，講授二年」。¹⁸¹ 王仰科舉不利，以教館為業，「教南都、太平，教浙藩，教松江，弟子日親，孜孜啟迪，必盡其才而由其誠」。¹⁸² 康熙《安福縣志》還記載了經師王光啟到外地教館的例子：「王光啟，字達生，南鄉百丈人。幼奇穎，未十齡應試，日午即完四藝，邑侯拔冠軍。尋補庠士。天啟甲子（1624）鄉試，以《春秋》中副榜。艾千子先生中經魁，心服光啟遺卷，薦遊湖南。一時岳麓、石鼓諸名宿，咸加敬焉。自是授徒傳經無虛歲。……所著有《春秋定旨》。」¹⁸³ 人口遷移也使安福《春秋》向外傳播。彭彥充之子彭澄任光祿署丞儀制時，「奉命使楚，愛宜春臺之勝，因卜居焉」，¹⁸⁴ 遂定居袁州府宜春縣，其子彭夔「邃於《春秋》之學，家庭之緒餘得於平日者為多」，¹⁸⁵ 入袁州府學，以《春秋》經中進士。劉廷篋（1472-?），字器重，「正德間補戍富谿，遂占籍」，正德二年（1507）順天鄉試舉人，正德六年進士。¹⁸⁶ 王士翹（1501-1570），字民瞻，安福金田人，占籍永新，嘉靖十三年（1534）以永新縣學增廣生中江西鄉試第三十五名，後中嘉靖十七年進士。¹⁸⁷ 安福士子占籍外地，自然也就為安福《春秋》學的外傳創造了條件。而且，外地學者慕名來安福學習《春秋》者，往往有之。江西寧州的周希令（1613 年進士）自述曾與淳安縣的徐有成（字二孺）「髫時曾同授經於麻城、安成間」。¹⁸⁸ 王夫之（1619-1692）稱其父親「少治《詩》，徙治《春秋》，躡屨束經，走安成、亭州（即麻城）問業」，「進業於安成劉氏」。¹⁸⁹

出版在安福《春秋》學的對外傳播中也值得重視。十四至十七世紀，有三部由安福學者撰寫的《春秋》經義著作影響較大，分別是李廉的《春秋會通》、鄒德溥的《春秋匡解》及康五瑞的《春秋纂要》。《春秋會通》本欲「藏之家塾，

¹⁸¹ 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卷四，〈送王石泉輟講歸安成序〉，頁 9。

¹⁸²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三，〈王孔橋墓志銘〉，頁 1058。

¹⁸³ 康熙《安福縣志》卷四，〈人物·文學〉，頁 101。

¹⁸⁴ 鄒守益，《鄒守益集》卷二三，〈大學生彭君師稷墓志銘〉，頁 1065。

¹⁸⁵ 毛紀，《鰲峰類稿》卷七，〈贈少參彭君師舜之任閩藩序〉，頁 7。

¹⁸⁶ 康熙《安福縣志》卷四，〈人物·宦績〉，頁 19。

¹⁸⁷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江西鄉試錄》，頁 19；《嘉靖十七年進士登科錄》，頁 37。

¹⁸⁸ 周希令，〈新刻春秋談虎講意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頁 337。

¹⁸⁹ 王夫之，《春秋家說》（收入《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3〕，第 5 冊），頁 105。

以備遺忘，訓子弟」，然「傳寫弗克禁」。¹⁹⁰《春秋匡解》「專擬春秋合題」，是晚明經典的科舉教科書，流行廣，版本多，在晚明有巨大的影響。¹⁹¹焦竑〈易會序〉云：「余友宮洗公汝光……所解《春秋》，卓為左、胡翼，逢掖之士宗之。」¹⁹²錢謙益幼時即以《春秋匡解》為入門讀本，在崇禎六年（1633）所作〈春秋匡解序〉中云：「余為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偶，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為有幸焉耳矣。」¹⁹³可見錢謙益非但以《春秋匡解》為入門，且以能作為安福《春秋》名家鄒德溥的再傳為幸。此外，鄒德溥還有《新鐫鄒翰林麟經真傳》、《春秋衡度》等書。¹⁹⁴康五瑞所在的安福洽水康氏，是清初安福有名的《春秋》學家族，父子數人皆精《春秋》。¹⁹⁵康五瑞《春秋纂要》十二卷，¹⁹⁶自稱本欲「傳諸家塾，非敢云問世」，最後在友人「無自私」的要求下出版。¹⁹⁷康五瑞自序云：「制科揣摩，簡

¹⁹⁰ 李廉，《春秋會通·原序》，頁164-165。

¹⁹¹ 《春秋匡解》有六卷本、八卷本、藍格抄本。永瑤，《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春秋匡解》六卷；張廷玉，《明史》卷九六，〈藝文一〉載：「鄒德溥《春秋匡解》八卷。」（頁2365）同治《安福縣志》卷一八，〈藝文·書目〉載：「《春秋匡解》八卷，鄒德溥撰。」今所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20冊所收乃影印上海圖書館所藏明藍格鈔本，不分卷。

¹⁹² 焦竑，〈易會序〉，鄒德溥，《易會》。

¹⁹³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九，頁876。

¹⁹⁴ 沈士端〈麟旨序〉：「鄒安成《衡度》一書，主持麟苑者垂三十年，其有功於後學甚鉅。」（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頁347）；《新鐫鄒翰林麟經真傳》有明·沈演、沈濟刊本，參見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學生書局，2009），頁411。

¹⁹⁵ 同治《安福縣志》載：「康綏猷，號亦庵，洽水人。幼失怙恃，以不及事親為慟。讀書淹貫經史，尤精《春秋》」；「康五瑞，字毓宣，南鄉洽水人，少通經史，尤邃於《春秋》，康熙丁丑（1697）進士」，「康五瓚，號琉光，五瑞弟，雍正丁未（1727）進士，……子定道，雍正癸卯（1723）鄉舉。」參見同治《安福縣志》卷一〇，〈人物·宦績〉，頁68, 70。

¹⁹⁶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八，〈藝文·書目〉載：「《春秋纂要》十二卷、《曲江樓古文》三卷，康五瑞撰。」（頁112）此書現存，但國內各大圖書館不藏。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北京歌德拍賣公司拍出清·康五瑞《春秋纂要傳本》十二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聚明堂刻本，四冊），參見<http://yz.sssc.cn/index/item?id=1723726>。

¹⁹⁷ 康五瑞，〈春秋纂要序〉，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七，頁38。

非有遺，繁非無節，展卷了然，或亦治《春秋》一徑。瑞不敏，幼隨家大人席側，口授心傳，選《左傳》，揭擬題，私幸所學有本，既而博採細訂，悉力刪輯，彙為《纂要》一書。」¹⁹⁸ 康五瑞不贊同「不涉闡題者概從刪」的學經方法，且主張「制科揣摩」也是治《春秋》之一條途徑。《春秋纂要》，是康五瑞家學的結晶，有康氏兄弟科舉成功為證。所謂來自友人「無自私」的督促，大概亦是實情，而亦安福《春秋》學對外傳播之一例。

因為肄習者少，各地著名的《春秋》經肄習者與家族之間，還能保持一定的互動，彼此有一定的瞭解。安福的《春秋》學者對全國各地的《春秋》經肄習的狀況也很清楚。耿定向記載了鄒德涵赴會試前的一件事情，說：「辛未（1571），（鄒德涵）將赴南宮，謂其仲曰：『吾於宇內人豪，獨傾心太倉王公，第得王公與校，吾遇矣』。是歲，果王公分校《春秋》經，得其文大賞，薦置高等。」¹⁹⁹ 太倉王公即王錫爵（1534-1614），嘉靖四十一年（1562）以《春秋》中會試第一名，隆慶五年（1571）禮闈《春秋》房同考官。²⁰⁰ 自稱「傾心太倉王公」，表明鄒德涵對王錫爵的《春秋》經有相當瞭解。瞭解的同時，安福學者也積極向各地《春秋》學者學習。劉球曾孫劉祚曾「受教於無錫二泉邵公」。²⁰¹ 二泉邵公即邵寶（1460-1527），是著名的《春秋》學者，著有《左觚》一卷。鄒守益之子鄒善，未舉前以文名，然猶謙謙然從人學，曾向福建丘生學習舉業。鄒德溥記其父云：「下帷乞乞，出入手一卷，以從時業。以文聲滋，益虛。聞閩丘生譚博士業得最，乘立舍舊。丘生狂，文稍爾弱，輒面斥。多士率厭避，獨先君傾心下之，至盡一帙抹殺弗慍，諒益切。未几，邑令睹其文，驚曰：子何自乃進一格？」²⁰² 可見，安福《春秋》學不但在輸出，也在輸入，直到晚明仍然是明代科舉化經學的《春秋》學中心之一。總之，安福縣《春秋》經的世家傳承以及由婚姻、師承而結成的網絡，是安福《春秋》經肄習綿延不絕的關鍵，而網絡本身卻又是開放的，既能吸納更多優秀的士子進入其中，又在對外傳播時同步吸取新知，從而使不同家族新陳代謝的同時，整個地域肄習《春秋》經的風氣卻得以維持。

¹⁹⁸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七，〈藝文·序〉，頁42。

¹⁹⁹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二，〈明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誌銘〉，頁13。

²⁰⁰ 《嘉靖四十一年會試錄》，頁16；《隆慶五年會試錄》，頁10。

²⁰¹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卷九，〈劉忠愍公年譜序〉，頁27。

²⁰² 鄒德溥，《鄒太史文集》，〈先考中奉大夫大常卿穎泉府君行狀〉，頁29。

六·安福《春秋》的終結

安福《春秋》經的科舉優勢一直延續到什麼時候？對此很難準確地劃一條界線。安福《春秋》的終結，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安福《春秋》在科舉鄉、會試中優勢的喪失；（二）在安福縣，《春秋》經相對於其他《詩》、《書》、《易》、《禮記》等經優勢的喪失。第一個層面的優勢喪失，是指安福的《春秋》經在科舉中與其他縣相比不再佔據優勢。這主要是因科舉考試競爭的加劇以及其他地區以《春秋》經應考水平的提高所致。第二個層面優勢喪失，往往是伴隨著第一個層面優勢的喪失而來，但可能會滯後一段時間。

安福《春秋》在科舉考試中優勢的衰弱，始於明朝後期。從十五世紀初期至十六世紀初期大約一百年的時間，是安福《春秋》經科舉最成功的時期。進入嘉靖朝（1522-1566）以後，安福《春秋》經的優勢逐漸不像之前那樣明顯。衰落的原因，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是來自其他地區的挑戰，內因則是部分優秀安福士子的興趣轉移。隨著科舉考試日益規範，之前一些不具有《春秋》學傳統的地區開始嘗試以《春秋》經應考，原本憑藉《春秋》經在科舉上有傳統優勢的地區的先發優勢逐漸被削弱，或者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保持這種優勢。例如，為《春秋》、《禮記》這兩種孤經在科舉中的優勢所吸引，陝西高陵縣學者周紹在十五世紀末四處尋找《春秋》、《禮記》之書，開高陵縣習《春秋》、《禮記》之風氣，「於是程吉治《春秋》，牛時用治《禮記》，而縣始有《春秋》、《禮記》之學」。²⁰³ 提學官的提倡，也會使越來越多的地區加入《春秋》經的肄習。正德年間，姚鏌提學福建，大力興學，「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鏌選明經分教諸邑，絕學始興」。²⁰⁴ 雖然尚不清楚是否與姚鏌的提倡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從嘉靖年間起，泉州府晉江縣的《春秋》經在科舉考試中迅速崛起，開始可以與安福、麻城相媲美，隱然有後來居上之勢。到明末，安福、晉江的《春秋》學是可以相提並論的。錢謙益〈翁子安制義序〉說：「子安……世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收羅旁魄，抉擿疑互，安成、晉江諸名家，皆為避席。」²⁰⁵

²⁰³ 嘉靖《高陵縣志》卷六，〈周紹傳〉、〈程吉傳〉，頁9。

²⁰⁴ 天啟《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90號，據明天啟四年刊本影印），卷七，〈人物·經濟〉，頁17。

²⁰⁵ 錢謙益，《牧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頁435。

從嘉靖年間起，安福縣除嘉靖三十五年（1556）和隆慶五年（1571）分別有二人和三人外，每年以《春秋》經中進士的人數一般在一人左右，佔全國《春秋》經進士的比率也多半在 5% 以下，而麻城、會稽、晉江等縣每科《春秋》經進士人數在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情况遠比安福縣要多；從嘉靖年間起，之前在《春秋》經上一直被安福壓制的麻城縣，也逐漸與安福持平，更多的時候還能勝出（參見表二、圖二）。浙江臨海縣的《春秋》經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開始在科舉中崛起，此後五十年中也對安福《春秋》構成強力的衝擊。也就是說，從嘉靖年間起，安福《春秋》遭遇到的挑戰既有來自傳統的以《春秋》為專經的縣，如麻城縣，也有來自新興的以《春秋》為專經的縣，如晉江縣。從所見四十六科《會試錄》的材料來看，嘉靖朝至明末的會試中式者，安福有十三人，麻城有二十二人，臨海有十三人，晉江有十二人（參見表二）。從《登科錄》的材料可以看到，嘉靖以前的二十九科安福的《春秋》經進士為七十九人，而之後的三十三科僅有二十人（參見表三），前後差別巨大。這說明，在會試層面，安福的《春秋》經從嘉靖年間起逐漸喪失了它之前的明顯優勢，而與麻城、臨海、晉江等縣持平甚至更弱。安福縣的《春秋》經所遭遇的挑戰，實際上可能更多。晚明吳興人沈士端〈麟旨序〉云：「自余先王父受是經於汪白泉（1511 年進士），吳興《春秋》與麻城、安福實稱鼎足。辛未（1571），平山先生繼起。」這表明，在嘉、隆時期，吳興《春秋》經的聲譽也已與安福、麻城相當。不過，在鄉試層面，安福《春秋》經的優勢倒是一直維續到明末。從嘉靖元年（1522）到天啟七年（1627），安福《春秋》經舉人仍佔全省《春秋》經舉人的 53%，只稍低於平均的 57%，且嘉靖以後的十四科鄉試經魁仍有九人出自安福（參見表四）。

另一方面，從內因看，吉安府的科舉自嘉靖年間以來的整體下滑，構成了安福《春秋》經優勢衰微的大背景。吉安府永新縣人甘雨（1579 年進士）說：「吾郡夙號材藪，……乃嘉隆以來數十年間，公車之額，浸不如前。」²⁰⁶ 晚明吉安府科舉相較於明初的衰弱，原因很複雜，但陽明學的流行或許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嘉靖朝起，吉安府尤其是安福縣成為了陽明學的重鎮。萬曆《吉安府志》稱：「至王陽明講學虔州，鄒文莊比面首事之，一時受業之徒三十餘人，故良知之學，安成獨精詣。」²⁰⁷ 儘管理學與科舉並不完全對立，陽明門人如鄒守益、張敷華、

²⁰⁶ 甘雨，《翠竹青蓮山房文集》（清咸豐九年刊光緒二年增補本，南昌：江西省圖書館藏），卷八，頁 22。

²⁰⁷ 萬曆《吉安府志》卷一一，〈風土志〉，頁 7。

劉陽、劉邦采等人皆能中進士或舉人，而信奉陽明學者如鄒德溥依然能取得高級功名。但是，陽明學在安福的流行，無疑卻為士子們提供了科舉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鄒守益長子鄒義會試不第，入國學，歸後「師事歐陽宗伯南野，研究紹興之旨」。²⁰⁸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鄒義在師從歐陽德（1496-1554）後就完全放棄了科舉，但是對理學的興趣至少會分散他在科舉上的精力。在康熙《安福縣志》所收六名「理學」人物中，進士二人（即鄒守益與王時槐）、舉人三人（即劉陽、劉邦采與劉元卿），只有劉文敏（1498-1572）未獲科第。然而，劉邦采（1492—約1578）「為邑諸生，即厭舉子業」，「服闕不復應試」，後因提學官趙淵之命赴試，中嘉靖七年舉人。劉元卿「弱冠即向往鄒文莊，慨然欲棄舉子業」。劉文敏更因專注陽明學而徹底放棄舉業。康熙《安福縣志》載：「兩峰劉先生文敏，字宜充，南鄉三舍人。……買舟趨越中謁王公，稱弟子，……朝暮門牆，往復更寒暑者三。時先生為邑庠生，以詞藝見長，廩食需貢有期，輒棄去，不復應舉。或以不妨學為言。先生曰：『安得許多閒精神，擔閣一生，吾計決矣！』」鄒守益門人朱調、劉肇宸、彭湘等人皆為諸生，然「謝青衿」，棄科舉，改事理學。周以魯「慕聖學，嘉靖戊子舉於鄉，即薄視制科，屢不上春官」。²⁰⁹ 據劉元卿說，嘉靖戊子（1528）江西鄉舉時，「安福士多從王氏學，有辟就舉者」。²¹⁰ 可見，資質佳者固然可以兼顧理學與科舉，然而崇尚理學而不專事科舉，多少會影響到安福《春秋》經在科舉上的競爭力。

來自其他《春秋》專經地區的挑戰以及內部士子的興趣轉移，使安福《春秋》科舉優勢不斷下降，反映在安福士子的本經選擇上，便是肄習其他經的情況逐漸增加。如果將表三列舉的六十二科《登科錄》分成三個階段，可以得出以下結果：嘉靖朝前的二十九科，安福縣的《春秋》經進士為 79 人，佔這二十九科安福進士總人數（125 人）的 63%；嘉靖朝十四科，安福縣《春秋》經進士為 9 人，佔這十四科安福進士總人數（23 人）的 39%；嘉靖朝後的十九科，安福縣《春秋》經進士為 11 人，佔十九科安福進士總人數（49 人）的 22%。這清晰地表明，進入十六世紀中期以後，安福士人對《春秋》的專注度也在下降，選擇其他經典作為本經的做法越來越多。從嘉靖年間起，安福縣一些家庭在選擇本經時也

²⁰⁸ 同治《安福縣志》卷一一，〈人物·儒林〉，頁 24。

²⁰⁹ 康熙《安福縣志》卷三，〈人物·理學〉，頁 8, 10, 14；卷三，〈人物·儒林〉，頁 21, 22；卷四，〈人物·宦跡〉，頁 24；卷四，〈人物·隱逸〉，頁 4。

²¹⁰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八，〈奉直大夫廣安州知州九亭伍公行狀〉，頁 17。

出現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變化。例如，蒙岡王氏向來以《春秋》為本經。王學夔從鄒賢學《春秋》，中正德九年（1514）進士。其弟王學益，字虞卿，以《春秋》經中嘉靖八年（1529）進士。²¹¹ 王維楨還說王氏「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玉，奕代不絕」。²¹² 然而，王學夔的從弟王學孔，字魯卿，以《易》經中嘉靖二年進士，²¹³ 已見改經的趨勢。如果說蒙岡王氏改易《春秋》本經的做法尚不典型，那麼安福縣著名的《春秋》經世家梅溪張氏在嘉靖年間本經選擇上的變化，就更有說服力了。梅溪張氏在《春秋》經上的科第成功，始於張洪、張敷華（1439-1508）父子。張洪是正統十年（1445）的進士。張敷華雖然只是天順七年（1463）會試《春秋》經的亞魁，但其經義文字以其熟悉傳註而獲考官欣賞，被收入《會試錄》。同考試官泰和歐陽熙批云：「此題本傳註，甚明白可曉。作者忽於記問，莫知所主，間有得者，又局促於文勢，不足以發之。此篇獨異眾作，有斷制，有筆力。」同考試官王獻批云：「融會傳意，而文足以發之。」²¹⁴ 正德六年，張洪的曾孫、張敷華之孫張鰲山復以《春秋》登進士。邵寶認為張鰲山在《春秋》經上很有造詣，評價其文「得左氏遺法」。²¹⁵ 可見，梅溪張氏在《春秋》經上是深有根柢的，而且四世之內三進士的成績也算得上很輝煌了。延續這樣的傳統，對於第五代人而言，原本是再正常不過的。然而，張鰲山的兒子張秩、張程，卻同時放棄《春秋》，分別改以《尚書》、《禮記》為本經。張秩，字以敬，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尚書》中進士；張程，字以孚，隆慶五年（1571）以《禮記》中進士。²¹⁶ 梅溪張氏改易本經，大概是認識到了始終以一經應科場的局限性，而分習《尚書》與《禮記》的做法表明梅溪張氏正刻意採用分習數經的方法來拓寬自己應試的方向。然而，梅溪張氏的第五代捨棄《春秋》學的傳統而改從其他經典，是不是也反證安福《春秋》的優勢正在喪失呢？晚明安福學者對《春秋》經的興趣確有轉移。這樣的例子可能還有，例如，謝來綬「家世業麟經，獨究心於易學」。²¹⁷

²¹¹ 《嘉靖八年會試錄》，頁16。

²¹² 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18冊，據明萬曆三十四年渭南王氏刊本影印），卷六，〈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頁11。

²¹³ 《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103；《嘉靖八年進士登科錄》，頁11。

²¹⁴ 《天順七年會試錄》，頁32。

²¹⁵ 康熙《安福縣志》卷三，〈人物·諍臣〉，頁76。

²¹⁶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登科錄》，頁31；《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錄》，頁36。

²¹⁷ 康熙《安福縣志》卷四，〈人物·隱逸〉，頁99。

進入十七世紀，安福《春秋》學的優勢進一步削弱。從表三看，儘管因為資料缺損而名錄不全，但從萬曆二十九年（1601）起到崇禎十三年（1640）間九科的登科錄中，僅有三位以《春秋》為本經的安福進士，即萬曆二十九年的顏欲章、萬曆三十五年的彭篤福、萬曆三十八年的王湯孫。從表二看，資料完整的兩科會試錄——《萬曆二十九年會試錄》和《萬曆四十七年會試錄》——之中，中式的安福《春秋》學者也只有二人，即顏欲章。這樣的成績，對於有著悠久的《春秋》經肄習傳統的安福縣來說，略顯孱弱。明末臨川人陳孝威就認為，江西的《春秋》經肄習者多集中於安福縣，但在鄒德溥、劉孔當之後便不再有傑出者。他說：「大江以西，耑攻者盛於安成，然自泗山、喜聞數先生而後，英絕不少概見。」²¹⁸ 入清以後，至少在會試層面，安福《春秋》經已經風光不再。對清初幾科科舉錄——《順治六年（1649）己丑科登科錄》、《順治十五年會試錄》、《康熙五十一年（1712）登科錄》——的考察發現：三科所錄取的《春秋》經的進士人數分別是十二人、三十一人、十三人，而唯有順治十五年的三十一人中有一名安福籍《春秋》經會試中式者，即顏象龍。之前明朝擅長《春秋》經的安福、麻城、閩縣、祁門、華亭等縣，多少還延續了其在《春秋》經上的一些作為，共計三科內，分別都有一至二名《春秋》經的進士，但顯然已經談不上有多少優勢了。而且，晚明以《春秋》學擅名科場的晉江縣，在清初的順治六年卻一次性地貢獻了三位以《易》為本經的進士——黃日祚、楊旬瑛、何承都——說明之前從嘉靖年間開始出現在安福縣的本經調整，在明末清初的晉江縣可能也同樣發生了。²¹⁹ 在晚明，前述曾經一度在《春秋》經上表現與安福、晉江一樣搶眼的吳興縣，「諸《春秋》家俱舍其故業，而授子弟以他經」。²²⁰ 顯然，科舉考試的公開競爭，使地域專經的優勢越來越小，專經的程度也越來越低。入清以後，安福的《春秋》經是否在鄉試層面還有優勢，尚不清楚。但是，清初科舉的地域配額制度雖然屢經變動，日益細化的趨勢卻很明顯。到康熙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奏

²¹⁸ 陳孝威，《壺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2冊，據清順治刻本影印），卷二，〈家弟少游春秋稿序〉，頁11。

²¹⁹ 參見《順治十五年會試錄》（清順治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頁9；《康熙五十一年登科錄》（清康熙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頁13；《順治六年己丑科登科錄》（清順治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頁18。

²²⁰ 沈士端，〈麟旨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頁347。

請分省取士，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並自康熙五十二年恩科起實施。²²¹ 這也就意味著，專經地域的競爭優勢從此只局限在一省之內。相對明代的南北中分卷制而言，會試分省錄取的制度使士子們「左限右隔、自相為戰」的意義更明顯。一個地域的專經優勢再大，也無法跨出一省的範圍自由競爭，去搶得更多的名額，像明代正德六年會試《春秋》經錄取二十一人而安福縣獨佔八人的情況，是再也不可能出現的。因此，會試分省取士，使地域專經的優勢從此更多地固定在鄉試層面，無法發揮到極致，從而對地域專經的優勢有進一步的消解。

科舉優勢的喪失，並不意味著安福《春秋》的完全終結。因為即便在鄉、會試中安福士人不能再以《春秋》學獲得優勢，強大的慣性也足夠讓《春秋》學在安福再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清初的安福縣，仍然有一些以《春秋》學聞名的學者，而那些有過《春秋》學傳統的家族，在獲取較低級別的功名時仍然主要依靠《春秋》經。吳節的七世孫吳琦，在雍正三年為《吳竹坡先生文集》所作跋中談到，雅源吳氏至雍正年間，家族子弟仍多以《春秋》入庠。他說：「家世自大常公而下，文章理學相望，及小子之身，今七世矣。中間科名雖亦微落，而一經之傳，兒輩猶能奉以周旋，或列庠序，或捷南宮，是皆先公之深仁厚澤所留者遠，而亦斯文之氣脈，其流風餘韻有以嘿佑之也。」²²²「一經之傳」的「一經」，自當指《春秋》無疑。可見，雅源吳氏肄習《春秋》經的傳統，至少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中期。整個十七世紀，鄒守益的後裔也基本上以《春秋》獲功名：在鄒守益的次子鄒美的二房之中，第十世（鄒守益孫輩）、十一世、十二世共有十七人獲得功名，除鄒德洙治《禮記》外，²²³ 其他人皆以《春秋》為本經；在第六子鄒蓋的六房之中，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世共十八人獲得功名，其本經皆為《春秋》，十世的鄒德淇和十三世的鄒球（1644-1717）分別中明崇禎十三年（1640）和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進士。鄒善派下，十三世鄒鍾鳴於清康熙十七年會試「掄經魁，……真能世其家學」。²²⁴ 進入十八世紀以後，鄒氏治《春秋》者仍然居多，但是以治《禮記》、《易》、《書》而獲功名的子弟不斷出現。這

²²¹ 李世愉，〈分省取士：科舉制的最終選擇〉，氏著，《清代科舉制度考辨（續）》（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12），頁8-11。

²²² 吳琦，〈跋〉，吳節，《吳竹坡先生文集》，頁327。

²²³ 《鄒氏文莊公次子美公家譜》（清刻本）載：「鄒德洙，字汝宗，號荊垣，治《禮記》，由邑廩膺萬曆己亥（1599）恩貢。」不過，鄒德洙的例子只是個案。之後，鄒德洙子鄒登明、鄒受明仍以《春秋》為本經。

²²⁴ 康熙《安福縣志》卷四，〈人物·文學〉，頁83。

表明，從十八世紀後期起，《春秋》在鄒氏的家學地位已經淡化。二房的十四世鄒綦（1699-1764）、十五世鄒世隆（1723-1752）、十六世鄒丕顯（1744-?）與鄒丕烈（1749-1788），祖孫四人皆以治《書》獲功名，在小家庭內形成了《書》經的家學傳承。²²⁵ 因此，從十五世紀末開啟的澈源鄒氏治《春秋》經的傳統，最終結束於十八世紀後期。作為十六世紀以來安福治《春秋》經最具代表性的家族，澈源鄒氏對《春秋》經的興趣轉移，是安福《春秋》終結的一個縮影。

隨著乾隆末年科舉制度的調整，地域專經的歷史將徹底終結。乾隆二十二年（1757），原本與《四書》一起安排在頭場的《五經》，改易到次場進行，頭場改考《四書》和論。乾隆四十七年，禮部議定以二場排律詩移置頭場，當年乾隆帝諭稱：「若頭場詩文既不中選，則二、三場雖經文、策論間有可取，亦不准復為呈薦。」²²⁶ 如此一來，經義文字非但被移置次場後，而且其在科舉錄取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小。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規定，五經輪流出題，擇五經之一命題；至乾隆五十八年，朝廷更規定科舉考試須五經各出一題。這就意味著，之前「考生報考時擇定專經並就各經作答的情形已經不再」，²²⁷ 同時表明，到乾隆後期，五經非但喪失科舉考試中頭場的地位，且士子從此不再有選擇本經的權利，也不復有這種必要。經義文字在科舉考試中完全淪為附庸。正因為此，從十八世紀末期起，澈源鄒氏的家譜中不見獲得功名的士子有習何經的記載，因為從此不再有「本經」或「專經」。此後，安福士子不需要再糾結於是否繼續堅持選擇傳統的優勢經學資源《春秋》，而安福《春秋》的歷史就此終結。伴隨安福《春秋》一起消失的，應該還有黃岡《禮記》、無錫《尚書》這樣與安福《春秋》一起共生數百年的科舉文化。

七·結語

分經取士的科舉政策，決定了每一個參加科舉的明代士子都必須有本經。要規避競爭，選擇本經就很講究。諸子分習數經反映了父母希望諸子貫通數經的良好願望，同時體現為一種多元發展以求利益最大化的多元競爭策略，但卻也意味著在購置書籍、聘請老師方面要消耗更多的資源。相反，一個家族、一個地域相

²²⁵ 參見《鄒氏文莊公次子美公家譜》、《文莊公第六子派下世次》。

²²⁶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8, 40。

²²⁷ 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頁161-162, 180-181。

對多數地選擇同一經典作為本經，則更像是一種集約化、專業化的競爭策略。沒有人在地域專經現象出現之前就刻意地規劃了這一切。一切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宋元時代的傳統經學資源是地域專經的基礎，而著名經師的教授往往是地域專經現象形成的契機。安福縣第一位《春秋》經進士伍洪，是元末安福縣《春秋》學名家李廉的朋友；明初安福縣最著名的經師鮑琮，是元儒胡可仕的門人。安福如此，其他地方《春秋》經在明代科舉中有突出表現者，同樣可上溯到宋元時代的《春秋》經學名家。嘉靖《淳安縣志》記載：「方格，字德奎，號京山，進賢里人，尤精於《春秋》，領淳熙丙午（1186）鄉薦……吾淳《春秋》之學，多其所源流云」；「張複，字明善，德性弘毅，旁究五經，而尤邃於《春秋》，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為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至今論淳安《春秋》者必曰吳朝陽、宋夢鼎、魯道源、張明善四先生云」。²²⁸ 華亭《春秋》的興起，則源於元末淳安縣《春秋》名家魯淵（1319-1377）在華亭縣李氏教塾。鄒守益〈世經堂記〉云：「（李氏）六世鎮撫，始調松江萬戶府，因家華亭，延名儒魯道源為諸子師，咸以《春秋》取第。……業《春秋》者率出李氏，至躋禁籍相望。」²²⁹ 因此，明代科舉下的地域專經，與宋元時代的經學傳統有承繼關係。在「庸俗」的科舉化經學與嚴肅的經學著作之間，似乎也不存在嚴格的界線。陳琛（1477-1545）從蔡清（1452-1508）學《易》，撰有《易經淺說》。《四庫全書總目》評論說：「大旨主於義理，然欲兼為科舉之計，故順講析講，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較（蔡）清《易經蒙引》，可謂每況愈下矣」。²³⁰ 可見，雖然解經方法上有區別，但未始不能兼顧。我們不否認科舉化經學的功利性與工具性。但是，是否功利性就會完全排斥學術性呢？明代的安福學者劉元卿就認為，圍繞科舉的鑽研與談經論道是可以共通的。他說：「執經程士者，匪定於一，斯王制弗信，故其防閑當嚴；談經論道者，匪極其趣，斯聖真弗著，故其檢括貴廣。此論治、論學兩者殊途，要未始不共貫而互為用也。」²³¹ 明人更有將經講與擬題合為一編者，如容宇光的《易經全題竅會編》。其〈凡例〉云：「初觀經講，研會聖賢傳注之精微，次玩擬題，探討主司命題之旨趣，庶一展卷而兩得之矣。」又如丁克

²²⁸ 嘉靖《淳安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6冊，據明嘉靖三年刻本影印），卷一一，頁11、16。

²²⁹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頁27-29。

²³⁰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七，「易經淺說八卷」條，頁53。

²³¹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卷四，〈明賢四書宗解序〉，頁6。

卿之《周禮要義》，採宋·葉時《禮經會元》、元·吳澄《周禮考註》等，「其他先儒之言，乃至試錄之策，亦間有採及者」，並不歧視科舉之經學。²³²《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的科舉化經學著作有激烈的批評，認為它對於經學無所發明，至視為「經學之蠹賊」，²³³其實只是反映了清儒的觀點。就明代學者而言，其對於科舉化經學著述的態度卻是有自信的一面。麻城人梅之煥在《春秋因是·自敘》中說：「士生數千年後，自不能盡合聖人作經之意。即不為傳題、比題，胡氏之言其能盡當於聖人作《春秋》之旨哉？苟不乖於大義，雖不得聖人之旨，固可以立教垂訓。舍聖人之經，不為傳註，自吐一辭，自發一論，亦經也。乃取聖人所筆削之書，挈彼度此，參稽互考，曲求當日褒譏是非之所在，以為不可，則余不知其說矣！」如前所述，明代學者博學如焦竑、錢謙益者，對安福鄒德溥在《春秋》經上的成就及其《春秋匡解》都讚譽有加，而錢謙益對遍註群經的季本(1485-1563)、郝敬(1558-1639)反而批評很多，認為他們的經學「踏駁支蔓」，連做科考用書的資格都沒有，²³⁴可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經學。從宋元時代的經學，到明代的科舉化經學，繼承的脈絡是清晰可見的。

不過，一個地域的傳統經學資源可能有多種，哪一種經典能夠發展成該地域科舉考試的利器，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而決定性的、關鍵性的則是該地域在明初科舉的成績。元末明初的安福縣士人於五經皆有研究，但後來唯有《春秋》經在明代科舉中表現優異。鮑琮的入籍安福及門人劉球、吳節、李紹等人在科舉考試中相對密集的成功，是安福士子共同趨向《春秋》經的開端。之後二百餘年的延續，則主要依靠家學的傳承。祖輩留下的知識積累與文化資源，不但使家族在科舉中長盛不衰，而且也穩定地使本地的專經程度維持在一定的高度。安福鄒氏肄習《春秋》經的傳統，從十五世紀末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顯現了家學傳承在地域學術發展中旺盛的生命力。家學傳承及家族在科舉上的不斷成功，則促成科舉世家的形成。在專經的地域內，科舉世家是最核心層，環繞在外的是與他們有婚姻或者師承關係的家族與士子，最外層是與他們全無關係的普通經師。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高級的科舉功名，他可能從此躋進科舉世家的圈子裏。如果科舉不

²³² 屈萬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收入《屈萬里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第13冊），頁6, 23。

²³³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三〇，「春秋因是三十卷」條，頁251。

²³⁴ 參見蔣秋華，〈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2(1998)：254-255。

利，他只能成為普通的經師，在本地或者外地教授學徒。如果他足夠優秀，他還可能成為科舉世家子弟們的經師。因此，地域專經的維續主要依靠的是相對私密的家學傳承，而專經之家亦多有家傳的經說，但這卻絕不代表壟斷和封閉，而是有足夠的開放與交流的。

在明代，家學傳承的環境已大不相同。宋代以來識字率的提高，使知識與文化不再局限於部分科舉世家。明代是一個幾乎全民參與科舉的時代。傳經也不再像漢唐時代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親授。發達的出版業，會進一步打破家傳經學的神秘感。晚明大量的《春秋》經科舉用書的出版，體現兩個特點：一是家傳經說的開放，如麻城劉守泰《春秋心問》、安福鄒德溥《春秋匡解》、黃安耿汝愚《耿氏春秋》、耿汝恣《春秋愍渡》及《麟經古亭世業》；二是各地《春秋》經肄習者之間有充分的交流，如淳安徐有成編纂的《新刻春秋談虎講意》不但包含了周希令、方尚恂會講的紀錄，還包括徐氏的「家藏秘本」，參閱者更囊括了各地的《春秋》名家，而梅之煥的《春秋因是》也有眾多的參閱者。參閱者的列名，可能是書坊出版策略的一種，但卻大概能反映晚明的科舉化經學藉助文社與出版已經進入到一個充分交流的階段。因此，到了明代後期，地域專經的程度已有些下降，更多的專經地域開始興起。這體現了科舉競爭下資源配置的合理流動。移民、教塾與出版，都促使人才與知識由專經程度高的地方向專經程度較弱的地方流動，從而逐漸拉平不同地域之間的差距。政府也在提倡這種平衡。萬曆年間，朝廷在會試中還實行「易業衡士」的政策，一個精通《易》的房考官，不能閱《易》房的試卷，改去閱《詩》房的試卷，²³⁵ 目的是為了防止在解經方法上相近的人之間的互相援引。因此，在人才與知識資源充分流動與政策的引導下，一個地域在某種經典上突出的科舉優勢會不斷被削弱。於是，一些傳統專經區域或科舉世家因此相應做出了調整本經的嘗試。安福縣《春秋》經的科舉優勢在晚明的衰弱，就是這種大環境下的結果。不過，安福《春秋》經在鄉試層面的科舉優勢至少延伸到明末，而像雅源吳氏、澈源鄒氏等《春秋》經科舉世家的家族成員也一直篤守自己家族的治經傳統，以《春秋》經考取生員的低級功名，直到十八世紀。因此，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的歷史，不是靜態的，而是一段在朝廷的科舉政策、地域內及地域間的資源互動、家族的科舉努力、士子的興趣與能力等各種因

²³⁵ 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2 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一，〈詩一房選稿序〉，頁 10。

素的影響下展開的複雜而變動不羈的歷史，不僅反映某個地域在科舉考試上的成功，也展現明代科舉化經學的空間布局以及明代經學史的一個面向。

（本文於民國一〇一年九月十八日收稿；一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表一：明代四十六科《會試錄》所見《春秋》經的錄取情況

科次	中式 人數	春 秋 經 中式 人數	春秋經 中式人 數比率	春秋經魁（加 *者為會元）	會試錄所錄春秋 程文（加*者為 安福人）
洪武四年 (1371)	120	40	33.33%	泰和楊自立	無
建文二年 (1400)	110	17	15.45%	崇仁吳溥*	吳溥
宣德五年 (1430)	100	11	11%	安福吳節	吳節*
宣德八年 (1433)	100	9	9%	安福李紹	李紹*
正統元年 (1436)	100	11	11%	山陰秦瑛	秦瑛、周瑄
正統四年 (1439)	100	12	12%	華亭錢溥	錢溥
正統七年 (1442)	150	18	12%	桐廬姚夔*	姚夔、熊璘
正統十年 (1445)	150	16	10.67%	麻城周鑑	周鑑、方杲
正統十三年 (1448)	150	14		安福彭時	彭時*
景泰二年 (1451)	200	24	12%	淳安吳福	劉宣*、吳福
景泰五年 (1454)	350	38	10.86%	安福彭華*	彭華*
天順元年 (1457)	300	28		安福彭彥充	彭彥充*、左贊
天順四年 (1460)	150	16	10.67%	會稽婁芳	汪諧、婁芳
天順七年 (1463)	250	27	10.8%	安福伍希淵	伍希淵*、 戴玉、張敷華*
成化二年 (1466)	350	38	10.86%	閩縣王俊	王俊、鍾蕃
成化八年 (1472)	250	26	10.4%	休寧吳鬱	吳鬱、劉鳳翔
成化十一年 (1475)	300	28	9.33%	建安楊仕偉	楊仕偉
成化十七年 (1481)	300	27	9%	安福歐陽旦	李銳、歐陽旦*
成化二十年 (1484)	300	27	9%	句容倪綱	倪綱
成化二十三年 (1487)	350	28	8%	華亭彭敷	程昊、彭敷
弘治十二年 (1499)	300	20	6.67%	閩縣林庭棊	秦禮、林庭棊
弘治十五年 (1502)	300	21	7%	貴溪畢濟川	畢濟川、張璉
弘治十八年 (1505)	300	20		嘉定州安磐	蔡潮、安磐
正德三年 (1508)	350	23	6.57%	仁和江曉	江曉、劉天和
正德六年 (1511)	350	21	6%	安福鄒守益*	鄒守益*、王寧

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

科次	中式 人數	春 秋 經 中式 人數	春秋經 中式人 數比率	春秋經魁（加 *者為會元）	會試錄所錄春秋 程文（加*者為 安福人）
正德九年 (1514)	400	26	6.5%	歙縣唐皋	席彖、唐皋
正德十二年 (1517)	350	25	7.14%	仁和江暉	歐陽必進*、 江暉、葉應驄
正德十五年 (1520)	350	23		蘄水周瑯	周瑯
嘉靖二年 (1523)	400	30	7.5%	臨海戴時弁	戴時弁、黃禎
嘉靖八年 (1529)	320	25	7.81%	安福王學益	王學益*、劉采
嘉靖十一年 (1532)	320	27	8.44%	高平郭望	郭望、陳玘
嘉靖二十年 (1541)	300	25	8.33%	華亭林樹聲 (陸樹聲)	林樹聲、方治
嘉靖二十三年 (1544)	320	26	8.13%	石埭畢鏘	畢鏘、宋賢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300	27	9%	彭城衛楊守魯	楊守魯、彭範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320	28	8.75%	永福王應時	王應時、王興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400	32	8%	丹陽姜寶	姜寶、孫鳴世
嘉靖三十五年 (1556)	300	24	8%	麻城耿定向	耿定向、常三省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300	24	8%	餘姚毛惇元	毛惇元、錢順時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300	24	8%	太倉王錫爵*	宗弘暹、王錫爵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400	32	8%	蒲州韓楫	韓楫、麻永吉
隆慶五年 (1571)	400	30	7.5%	烏程吳秀	吳秀、劉臺*
萬曆二年 (1574)	300	24	8%	海甯陳與郊	陳與郊、陶允宜
萬曆五年 (1577)	300	22	7.33%	連州馬象乾	馬象乾、甘雨
萬曆十四年 (1586)	350	27	7.71%	桐城吳應賓	李大武、彭遵古
萬曆二十九年 (1601)	300	22	7.33%	太倉王衡	?
萬曆四十七年 (1619)	350	24	6.86%	鄞縣錢敬忠	?
總計及平均率	12,860	1,107	8.6%		

表二：明代四十六科會試《春秋》經中式者的地域分布（超過十人以上的縣）

	安 福	麻 城	閩 縣	歙 縣	淳 安	臨 海	祁 門	會 稽	羅 山	海 陽	晉 江	遂 寧	東 莞	華 亭
洪武四年 (40)	1		1		1	2		1					1	
建文二年 (17)			1		1									
宣德五年 (11)	2			2										
宣德八年 (9)	1	1			1									
正統元年 (11)	2			1	1		1							
正統四年 (12)	1	1	1						1	1				1
正統七年 (18)	2	1							1				1	
正統十年 (16)	1	2	1	1			3	1		2				1
正統十三年 (14)	2			1										1
景泰二年 (24)	3			1	2				1	1				
景泰五年 (38)	6		2	1			1		1	1		1		1
天順元年 (28)	2		1		3			1						
天順四年 (16)	1				2		1	1				1	1	
天順七年 (27)	4		1			1	2		1	1			1	
成化二年 (38)	5	1	3		1		1				1			
成化八年 (26)	1	1		2	1					1				1
成化十一年 (28)	2		2	1	4				1	1				
成化十七年 (27)	1	1	2		2		2		1					1
成化二十年 (27)	2	3	1	4			1			1		2		
成化二十三年 (28)	3	1		2			1	1	1	1		1		1
弘治十二年 (20)	4	2	1	1		1	1			1				
弘治十五年 (21)	2			1	2					2			3	
弘治十八年 (20)	2		3		1	2			1					
正德三年 (23)	4	1		2	1	1	1		1			1		
正德六年 (21)	7	1		1										1
正德九年 (26)	3	3	1	2		1						1	1	
正德十二年 (25)	4		1			1	1	2				2	1	
正德十五年 (23)	1	1				1			1					
嘉靖二年 (30)	1	2				1	1							

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

	安 福	麻 城	閩 縣	歙 縣	淳 安	臨 海	祁 門	會 稽	羅 山	海 陽	晉 江	遂 寧	東 莞	華 亭
嘉靖八年 (25)	1	2		2	1	1		1			1	1	1	
嘉靖十一年 (27)		1		1		1			1	1	2	1		
嘉靖二十年 (25)		1	3					1	1			1		1
嘉靖二十三年 (26)	1		1	1		3		1				1		1
嘉靖二十六年 (27)	1		2	2										
嘉靖二十九年 (28)		1	1			4			1		1			
嘉靖三十二年 (32)		2		1		1							1	
嘉靖三十五年 (24)	2	1	1			1	1	2						
嘉靖三十八年 (24)	1	2									1			
嘉靖四十一年 (24)		1	1		1				1					
嘉靖四十四年 (32)		2						2		1	1		1	
隆慶五年 (30)	3	3	1								3			
萬曆二年 (24)		1	1	1				2			1			
萬曆五年 (22)	1					1								
萬曆十四年 (27)	1	2									2			
萬曆二十九年 (22)	1							1	1				1	
萬曆四十七年 (24)		1												
合計	82	42	33	31	25	23	18	17	16	15	13	13	13	10
佔四十六科會試 春秋中式者比率	7.4 %	3.8 %	3 %	2.8 %	2.3 %	2 %	1.6 %	1.5 %	1.4 %	1.4 %	1.2 %	1.2 %	1.2 %	0.9 %
各縣四十六科進士 總人數 ²³⁶	166	50	135	90	36	83	32	73	19	32	166	16	47	79
以春秋為本經者佔 該縣四十六科進士 人數比率	49 %	84 %	24 %	34 %	69 %	28 %	56 %	23 %	84 %	47 %	8 %	81 %	28 %	13 %

²³⁶ 各縣四十六科進士總人數的資料來源：同治《安福縣志》卷八；光緒《麻城縣志》卷一五；乾隆《福州府志》卷三九；道光《歙縣志》卷七；光緒《淳安縣志》卷八；洪若皋，《臨海縣志》（清末刻本），卷五；同治《祁門縣志》卷二二；康熙《會稽縣志》卷二〇；葛荃，《羅山縣志》（清末刻本），卷六；雍正《海陽縣志》卷六；道光《晉江縣志》卷三〇；乾隆《遂寧縣志》卷六；嘉慶《東莞縣志》卷二三；乾隆《華亭縣志》卷一〇。

表三：明代《進士登科錄》中的安福《春秋》經

	該科 進士 總數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春秋經 佔進士 人數 比率	安福該科 進士人數 (據 同 治 《 安 福 縣 志 》)	安 福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業春秋 經者佔 安福進 士總數 的比率	安福春 秋佔全 國春秋 經進士 的比率
洪武四年 (1371)	120	39	32.5%	1	1	100%	2.56%
永樂十年 (1412)	150	14	9.33%	0	0	0	0
宣德五年 (1430)	100	10	10%	4	2	50%	20%
宣德八年 (1433)	99	?		1	1	100%	
正統四年 (1439)	99	12	12.12%	1	1	100%	8.33%
正統七年 (1442)	149	17	11.41%	4	2	50%	11.76%
正統十年 (1445)	150	18	12%	3	1	33%	5.56%
正統十三年 (1448)	150	18	12%	5	3	60%	16.67%
景泰二年 (1451)	201	23	11.44%	8	3	38%	13.04%
景泰五年 (1454)	349	38	10.88%	12	6	50%	15.79%
天順元年 (1457)	294	33	11.22%	6	4	67%	12.12%
天順四年 (1460)	156	17	10.9%	1	1	100%	5.88%
天順八年 (1464)	247	26	10.53%	6	5	83%	19.23%
成化二年 (1466)	253	39	15.42%	6	5	83%	12.82%
成化五年 (1469)	247	28	11.34%	3	1	33%	3.57%
成化八年 (1472)	250	26	10.4%	2	1	50%	3.85%
成化十一年 (1475)	300	28	9.33%	6	3	50%	10.71%
成化十四年 (1478)	350	33	9.43%	4	2	50%	6.06%
成化十七年 (1481)	298	26	8.72%	3	1	33%	3.85%
成化二十三年 (1487)	351	28	7.98%	4	3	75%	10.71%
弘治三年 (1490)	298	24	8.05%	6	5	83%	20.83%
弘治六年 (1493)	298	22	7.38%	3	1	33%	4.55%
弘治九年 (1496)	300	18	6%	5	3	60%	16.67%
弘治十五年 (1502)	300	21	7%	2	2	100%	9.52%
弘治十八年 (1505)	303	21	6.93%	3	2	67%	9.52%

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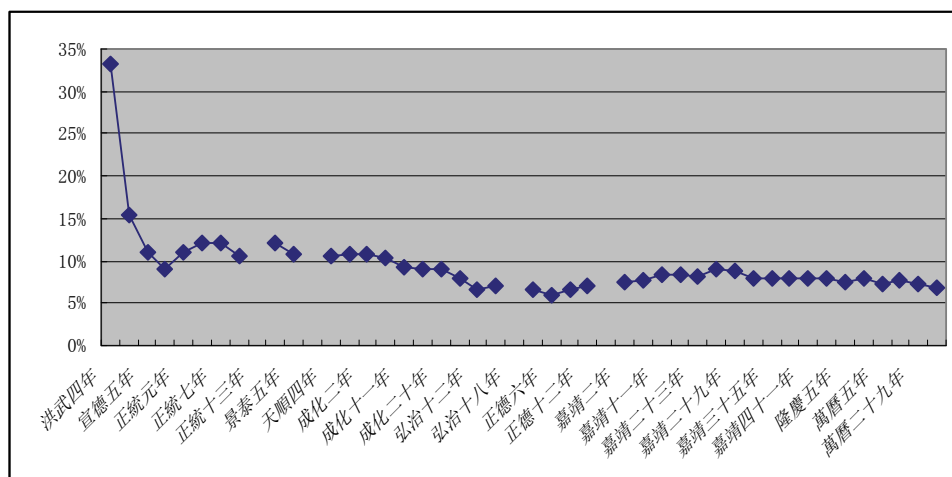
	該科 進士 總數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春秋經 佔進士 人數 比率	安福該科 進士人數 (據 同 治 《 安 福 縣 志 》)	安 福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業春秋 經者佔 安福進 士總數 的比率	安福春 秋佔全 國春秋 經進士 的比率
正德三年 (1508)	350	23	6.57%	8	4	50%	17.39%
正德六年 (1511)	349	21	6.06%	11	10	91%	47.62%
正德十二年 (1517)	349	26	7.45%	6	5	83%	19.23%
正德十六年 (1521)	330	23	6.9%	1	1	100%	4.35%
嘉靖二年 (1523)	410	30	7.32%	7	1	14%	3.33%
嘉靖八年 (1529)	323	26	8.05%	3	1	33%	3.85%
嘉靖十一年 (1532)	316	26	8.23%	0	0	0	0
嘉靖十四年 (1535)	325	24	7.38%	1	1	100%	4.17%
嘉靖十七年 (1538)	320	26	8.13%	1	1	100%	3.85%
嘉靖二十年 (1541)	300	25	8.3%	0	0	0	0
嘉靖二十三年 (1544)	312	26	8.33%	2	1	50%	3.85%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301	25	8.31%	2	1	50%	4%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320	28	8.75%	0	0	0	0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403	30	7.44%	0	0	0	0
嘉靖三十五年 (1556)	296	24	8.11%	3	2	67%	8.33%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303	22	7.26%	2	1	50%	4.55%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299	24	8.02%	1	0	0	0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394	28	7.11%	1	0	0	0
隆慶二年 (1568)	400	30	7.5%	3	0	0	0
隆慶五年 (1571)	396	27	6.82%	8	2	25%	7.41%
萬曆二年 (1574)	299	24	8.03%	0	0	0	0
萬曆五年 (1577)	301	20	6.64%	2	1	50%	5%
萬曆八年 (1580)	300	23	7.67%	3	2	67%	8.7%
萬曆十一年 (1583)	341	23	6.74%	4	1	25%	4.35%
萬曆十七年 (1589)		26		4	0	0	
萬曆二十年 (1592)	310	22	7.1%	3	1	33%	4.5%

陳時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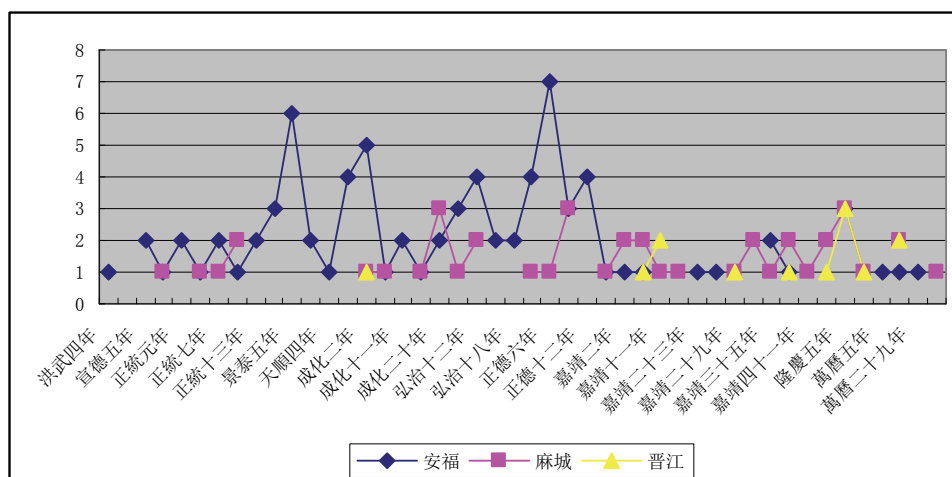
	該科 進士 總數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春秋經 佔進士 人數 比率	安 福 該 科 進 士 人 數 (據 同 治 《 安 福 縣 志 》)	安 福 春 秋 經 進 士 人 數	業春秋 經者佔 安福進 士總數 的比率	安福春 秋佔全 國春秋 經進士 的比率
萬曆二十三年 (1595)		15		1	1	100%	
萬曆二十六年 (1598)		23		1	0	0	
萬曆二十九年 (1601)	300	22	7.26%	3	1	33%	4.5%
萬曆三十二年 (1604)		24		0	0	0	
萬曆三十五年 (1607)	298	22	7.38%	2	1	50%	4.5%
萬曆三十八年 (1610)	232	19	8.1%	3	1	33%	5.2%
萬曆四十七年 (1619)	350	24	6.8%	4	0	0	0
崇禎四年 (1631)		24		1	0	0	0
崇禎七年 (1634)		22		0	0	0	0
崇禎十年 (1637)		23		3	0	0	0
崇禎十三年 (1640)	252	23	9.13%	4	0	0	0
合計		1,409		197	99	50%	7.03%

表四：明代《鄉試錄》中的安福《春秋》經

	江西 舉額	春 秋 經 中 舉 人 數	春 秋 經 舉 人 比 率	安福 春秋 經舉 人數	安福春 秋佔春 秋經舉 人比率	安 福 縣 舉 人 數 (同 治 《安福縣 志》)	安福春 秋經佔 該縣舉 人比率	安福籍 的春秋 經魁
天順三年 (1459)	95	10	10.5%	5	50%	15	33.3%	周重
成化十年 (1474)	95	9	9.5%	4	44%	8	50%	
成化十三年 (1477)	95	9	9.5%	6	67%	11	54.5%	王佐
弘治二年 (1489)	95	9	9.5%	3	33%	9	33.3%	
弘治五年 (1492)	95	8	8.4%	7	88%	10	70%	阮芳
弘治十四年 (1501)	95	8	8.4%	8	100%	13	61.5%	劉禔
正德二年 (1507)	95	7	7.4%	4	57%	13	30.8%	
正德十一年 (1516)	95	7	7.4%	5	71%	15	33.3%	萬振聲
嘉靖元年 (1522)	190	17	8.9%	11	65%	19	57.9%	伍希張
嘉靖四年 (1525)	95	7	7.4%	6	86%	14	42.9%	阮范
嘉靖七年 (1528)	95	7	7.4%	4	57%	12	33.3%	
嘉靖十三年 (1534)	95	7	7.4%	5	71%	8	62.5%	
嘉靖十九年 (1540)	95	8	8.4%	4	50%	8	50%	萬玖
嘉靖二十五年 (1546)	95	8	8.4%	1	13%	2	50%	劉憲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95	8	8.4%	2	25%	4	50%	彭汝賢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95	7	7.4%	4	57%	10	40%	顏持全
嘉靖四十年 (1561)	95	7	7.4%	4	57%	8	50%	王廷俊
嘉靖四十三年 (1564)	95	6	6.3%	3	50%	5	60%	
隆慶四年 (1570)	95	5	5.3%	3	60%	4	75%	劉元卿
萬曆四年 (1576)	95	6	6.3%	3	50%	6	50%	
萬曆七年 (1579)	95	6	6.3%	2	33%	7	28.6%	
天啟七年 (1627)	102	6	5.9%	4	67%	9	44.4%	趙希琇
合計及平均率	2,192	172	7.8%	98	57%	210	46.7%	



圖一：明代歷科會試《春秋》經中式人數佔會試中式總人數的比率



圖二：明代歷科會試《春秋》經中式人數在安福、麻城、晉江三縣的分布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2010。
- 《天啟七年江西鄉試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學生書局，1969，第22冊。
- 《天順元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2冊。
- 《文莊公第六子派下世次》，民國刊本。
- 《弘治九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4冊。
- 《正德十五年會試錄》，明正德十五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正德三年進士登科錄》，明正德三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正德三年會試錄》，明正德三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安成鄒氏重修支譜》，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 《成化八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3冊。
- 《成化十一年會試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第116冊，據明成化刻本影印。
- 《康熙五十一年登科錄》，清康熙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麻城耿氏族譜》，清同治五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順治十五年會試錄》，清順治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順治六年己丑科登科錄》，清順治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歷履便覽》，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21冊。
- 《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登科錄》，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萬曆丙戌科（1586）進士同年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20冊。
- 《鄒氏文莊公次子美公家譜》，清刻本。
- 《嘉靖三十七年江西鄉試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13冊。
- 《嘉靖丙辰（1556）同年世講錄》，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第13冊。
- 《澈源鄒氏七修族譜》，清乾隆五年刻本。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明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毛紀，《鼇峰類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45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王夫之，《春秋家說》，收入《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3，第5冊。

陳時龍

- 王時槐，《友慶堂存稿》，明萬曆三十八年蕭近高刻本，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資料室藏。
- 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18冊，據明萬曆三十四年渭南王氏刊本影印。
-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甘雨，《翠竹青蓮山房文集》，清咸豐九年刊光緒二年增補本，南昌：江西省圖書館藏。
- 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安希范，《安我素天全堂集》，清乾隆間安吉校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吳節，《吳竹坡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冊，據清雍正三年吳琦刻本影印。
- 吳寬，《家藏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55冊。
-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0-61冊，據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影印。
-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據清道光二十二年宋氏中和堂刻本影印。
- 李呈祥，《古源山人日錄》，收入《國家珍貴古籍選刊》，揚州：廣陵書社，2009，第2冊，據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敬之、李謙然刻本影印。
- 李時勉，《古廉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冊。
- 李舜臣，《愚谷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3冊。
- 李廉，《春秋會通》，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62冊。
- 李鄴嗣，《杲堂詩文鈔》，收入《四明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06，第29冊。
- 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
- 周希令、方尚恂、徐有成，《新刻春秋談虎講意》，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4-5冊，據明天啟甲子刻本影印。
- 周怡，《周訥谿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周氏燕翼堂刻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 周敘，《石溪周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1冊，據明萬曆二十三年周承超等刻本影印。
-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冊，據清康熙二年在茲堂刻本影印。

- 姚鏞，《東泉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6 冊，據明嘉靖刻清修本影印。
-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 冊，據明弘治姚璽刻本影印。
- 姜寶，《姜鳳阿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7-128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徐紘，《皇明名臣琬琰錄》，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 1 冊。
- 秦繼宗，《尚書彙解》，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貳輯第 4 冊，據萬曆刻本影印。
-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1 冊，據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影印。
- 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
- 商輅，《商文毅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5 冊，據萬曆三十年劉體元刻本影印。
-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
- 崔銑，《洵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7 冊。
-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張時徹，《芝園定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2 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明人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 116-124 冊。
- 梅之煥，《春秋因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28 冊，據清初金閭孝友堂刻本影印。
- 郭景昌、賴良鳴編，《吉州人文紀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27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陳孝威，《壺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集部第 72 冊，據清順治刻本影印。
- 陳循，《芳洲先生文集》，明萬曆四十六年陳以躍刻本，南昌：江西省圖書館藏。
- 陳循，《芳洲文集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328 冊，據明萬曆四十六年陳以躍刻本影印。
- 傅維麟，《明書列傳》，收入《明人傳記叢刊》第 87-88 冊。

陳時龍

彭時，《彭文憲公集》，清乾隆間彭坊重刻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6 冊，據清康熙五年彭志楨刻本影印。

彭華，《彭文思公文集》，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 11 冊，據明弘治十六年安福彭氏刻本影印。

焦竑，《獻徵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

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 15 冊，據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影印。

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黃宗羲，《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黃景昉著，陳士楷、熊德基點校，《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楊士奇，《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0 冊，據舊鈔本影印。

葉盛，《菴竹堂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5 冊，據清初鈔本影印。

過庭訓，《本朝京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0-63 冊，據明末刻本影印。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5-66 冊，據清刻本影印。

鄒守益著，董平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鄒德溥，《易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3-14 冊，據清同治九年袁州府學副齋活字本影印。

鄒德溥，《春秋匡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20 冊，據明藍格鈔本影印。

鄒德溥，《鄒太史文集》，清安成紹恩堂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管大勳，《光祿集》，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孤本秘笈叢刊》第 18 冊，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4 冊，據清咸豐二年重刻本影印。

劉定之，《呆齋前稿十六卷存稿十卷續稿五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 冊，據明萬曆二十二年楊一桂補刻本影印。

劉球，《兩谿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3 冊。

- 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0 冊。
- 黎淳，《黎文僖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0 冊，據明嘉靖三十五年陳甘雨刻本影印。
- 蕭鎡，《尚約文鈔》，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 冊，據清光緒三十一年蕭氏趣園刻本影印。
-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錢謙益，《牧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2 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2 冊，據嘉靖四十三年吳鳳瑞刻隆慶六年印本影印。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二·地方志書

- 嘉靖《吉安府志》十六卷存十二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31 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嘉靖《高陵縣志》七卷，呂柟纂修，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7，第 6 冊，據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清光緒十年刻本影印。
- 嘉靖《淳安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第 16 冊，據明嘉靖三年刻本影印。
- 嘉靖《瑞金縣志》八卷，趙勳修，林有年纂，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40 冊，據明隆慶刻本影印。
- 萬曆《吉安府志》三十六卷，余之禎纂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第 10 冊，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
- 天啟《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華中地方第 490 號，據明天啟四年刊本影印。
- 康熙《安福縣志》八卷，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孤本方志選編》，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影印。
- 乾隆《黃州府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道光《江陰縣志》，清道光二十年刊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同治《安福縣志》十八卷，清·姚濬昌修，周立瀛、趙廷愷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第 67 冊，據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陳時龍

同治《咸寧縣志》十五卷首一卷，陳怡等修，雷以緘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 27 冊，據清同治五年刻本影印。

光緒《麻城縣志》五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鄭慶華修，潘頤福纂，清光緒二年刊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光緒《續輯咸寧縣志》八卷首一卷，清·陳樹楠、儲可權修，錢光奎、余益杞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27 冊，據清光緒八年刊本影印。

民國《麻城縣志前編》十五卷首一卷，鄭重修，余晉芳纂，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民國《陽城縣鄉土志》不分卷，楊念先修纂，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 74 號，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三·近人論著

王楚平

2011 《黃岡歷代進士考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德昭

1984 《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朱保炯、謝沛霖

1980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鴻林

2006 〈劉基《春秋明經》的著作年代問題〉，《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4：4-12。

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2010 〈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氏著，《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58-181。

李世愉

2012 〈分省取士：科舉制的最終選擇〉，氏著，《清代科舉制度考辯（續）》，瀋陽：萬卷出版公司，頁 8-11。

李治安

2003 〈元代鄉試新探〉，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594-624。

沈俊平

2009 《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學生書局。

吳宣德

2009 《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吳宣德、王紅春

2011 〈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7.1：99-111。

汪泰榮

2004 《廬陵古文獻考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汪維真

2011 〈明清會試十八房源流考〉，《史學月刊》2011.12：36-53。

周啟榮 (Chow Kai-wing)

2012 〈為功名寫作：晚明的科舉考試、出版印刷與思想變遷〉，張聰、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17-244。

屈萬里

1984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收入《屈萬里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第 13 冊。

宗韻

2009 《明代家族上行流動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高立人編

2007 《廬陵古碑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郭培貴

2008 《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育齊

2009 〈思想人物與地方社會的交涉——以晚明湖北麻城、黃安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張藝曦

2006 《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陳長文

2006 〈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史學月刊》2006.11：44-48。

陳時龍

2010 〈天一閣藏《明史稿·鄒來學傳》校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大東文化大學編，《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384-401。

陳時龍

楊晉龍

- 1996 〈《詩經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頁 317-346。

劉昔章、姚義興主編

- 2005 《瀟瀟人家》，安福：政協安福縣委員會、安福縣志編纂委員會。

劉曉東

- 2012 〈明代私塾中的「師徒」關係芻議〉，《東北師大學報》2012.6：69-74。

蔣秋華

- 1998 〈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2：253-294。

錢茂偉

- 2004 《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鶴成久章

- 2000 〈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52：208-222。
- 2006 〈明代餘姚の『禮記』學と王守仁——陽明學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東方學》111；中譯見〈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關於陽明學成立的一個背景〉，吳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356-367。

Langlois, John D., Jr. (藍德璋)

- 1982 “Law, statecraft,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uan political thought.” In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ited by Hok-lam Chan and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9-152.

Rowe, William T. (羅威廉)

- 2007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gional Focus on the Classics in Mi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A Case Stud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earning in Anfu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Shilong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riginally named the Five Classics (*Wujing* 五經) as the core of the curriculum that is to be examined, but in actual practice every student needed to master only one of the Five Classics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The chosen classic, also the one on which he would be tested, became the student's "basic classic" (*benjing* 本經). In Anfu (安福), a county in Ji'an Prefecture, Jiangxi Province, most students favor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春秋) over the other four classics and performed outstandingly in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examinations. The established tradition in the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Anfu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and local scholar Bao Cong's teaching of this classic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ogether accounted for the initial rise of the learning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Anfu. Many of Bao's disciples, namely Liu Qiu (劉球) and Wu Jie (吳節), succeeded in subsequent examinations and began to instruct students in Imperial Academy (*Han-lin yuan* 翰林院)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Guo-zi Jian* 國子監), which further built up the nationwide reputation of Anf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lassic learning. Fellow scholars from Anfu, namely Peng Shi (彭時), Peng Hua (彭華), Zou Shouyi (鄒守益) and Zou Depu (鄒德溥), and their success in the examinations at different time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n this particular classic in Anfu throughout many generations. Consequently, many families, namely the Wu's (伍), Liu's (劉), Peng's (彭), Zou's (鄒), tended to inherit a family tradition of encouraging their members to choos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their basic classic, which yet again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learn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Anfu County. These clans formulated a complexly intertwined but not completely closed network due to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 and inter-marriages, and their teach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ten spread as members of the clans immigrated, began teaching at other private schools or published

陳時龍

anno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learn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Anfu continued to flourish for nearly 200 years betwee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before it began to face fierce challenge coming from both traditional rival the Macheng (麻城) county and new competitor the Jinjiang (晉江) county, which began approximately during the Jiajing (嘉靖)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17th century, Anfu scholars benefited less from their expertis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performed comparatively less astonishingly in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long-term tradition, many Anfu students until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kept choosing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their basic classic and obtained junior degrees. During the Qianlong (乾隆)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olicy changed greatly, with the test on the classics shifted from the first exam to the second and now consisted of five questions corresponding to all Five Classics. This not only reduc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st on the classics in the examination, but also made it unnecessary for the students to choose a basic classic, marking an end to the regional focus on the Classic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words: basic classic, Anfu County,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mperial examination, regional focus on the Classics